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17 年 第 9 卷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





2017 年 第 9 卷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在线期刊,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的会议论文集发行。

Editors

Marta C. Lourenço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Lisbon
Rua da Escola Politécnica, 58
1250-102 Lisboa, Portugal

Barbara Rothermel
Daura Gallery - Lynchburg College
1501 Lakeside Dr., Lynchburg, VA 24501 - USA

Andrew Simpson
Department of Ancient History
Macquarie University
NSW 2109 Australia

Copyright © International ICOM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http://umac.icom.museum>

Graphic edition: Cristina Luís, Lisbon, Portugal

ISSN 2071-7229

Each paper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UMACJ (中文版)

策 划 / 刘绍学 郭 骥
翻 译 / 陈力子 吴 悠
审 译 / 肖福寿
编 审 / 刘志强 郁 慧
排 版 / 谭 茜
校 对 / 邵文菁

上海大学博物馆
中国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200444

UMACJ (中文版) 获得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授权

项目得到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上海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支持



封面图片：

这个 16 世纪的浑天仪 (armillary sphere) 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University of Padua) 物理系 (Cabinet of Physics) 的藏品之一。该仪器由实验物理学教授塞尔瓦多·达·内格罗 (Salvatore Dal Negro) 于 19 世纪 20 年代购得，用于讲授早期天文学课程。该仪器是十分罕见的模型，通过内部两球体 (即地心第八和第九层区域) 在外部第十层内的运动来显示二分点的振动和岁差。振动理论提出于中世纪，16 世纪末因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研究成果而被否定。仪器的地平线环和三脚架是 19 世纪的人们添加上去的。

尺寸：高 50 厘米，直径 36 厘米。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物理学史博物馆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hysics) 收藏，佛兰科·扎尼尼 (Franco Zannini) 拍摄。



目 录

导言

重新审视大学博物馆的相关文献

Marta C. Lourenço, Barbara Rothermel, Andrew Simpson

UMAC 米兰年会论文集：博物馆与文化景观

古巴的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和发扬哈瓦那 CUJAE 大学文物收藏及景观的方法体系

Carina Marrero Leivas

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德国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

Cornelia Weber, Martin Stricker

大学博物馆反映的大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案例分析

胡盈

大学博物馆在新文化景观形成中的角色：伊斯坦布尔金角湾案例

Nurten Özdemir, Hikmet Sivri Gokmen

科技博物馆在佩特雷大学文化景观发展中的角色

Penelope Theologi-Gouti, Evangelos Vitoratos

为沉睡的学术遗产注入生机：西班牙大学与中学案例研究

Isabel García, Luis Mayo, María José Gómez

论文

艺术与工艺：收藏的多义与活力

Marie-Sophie Corcy, Lionel Dufaux, Dominique Ferriot

导言



重新审视大学博物馆的相关文献

Marta C. Lourenço, Barbara Rothermel, Andrew Simpson / 文
陈力子 / 译

大学博物馆与收藏委员会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UMAC) 成立于 2001 年,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下属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成立以来 UMAC 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 并出版会议的论文集。

2001 年巴塞罗那会议后出版的首册会议论文集和 2002 年悉尼会议论文集由里斯本大学 (University of Lisbon) 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主办的《博物馆学》(*Journal Museologia*) 杂志出版; 2003 年会议论文集由会议主办方奥克拉荷马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 的山姆·诺布尔自然历史博物馆 (Sam Noble Oklahom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独立出版; 2004 年会议作为 ICOM 首尔年会的一部分, 与 2005 年乌普萨拉会议 (Uppsala Meeting) 一道, 收录于克拉科夫亚捷隆大学博物馆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Museum Collegium Maius) 出版的《博物馆小品》(*Opuscula Musealia*) 期刊第 15 期; 2006 年墨西哥城会议 (Meeting in Mexico City) 以主题形式出版双语 (西班牙语、英语) 论文集, 主题为“大学博物馆的新道路” (*New Road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由主办方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出版。

可以说, 此前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并没有太多有关大学博物馆和收藏的文章。除了个别例外, 大部分有关这个看似专业性很强的主题的文章都以“灰色文献” (grey literature) 的形式发表, 其中包括报告、专项研究、综述以及高校师生未发表的研究文章等。因此, 当早期 UMAC 会议要出版多主题论文集时, UMAC 委员会, 更确切地说, UMAC 出版工作小组很高兴看到有机构愿意支持这项事业, 由机构来赞助出版会议论文集。早期会议论文集呈现了学科多样性以及地理分布广泛性, 这不仅体现了 UMAC 事业的独特国际视角, 也预示着人们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关注。



由于作者和编辑遍布多国,纸质期刊的出版较为困难,制作和运输的成本昂贵,这就意味着 UMAC 成员们和其他有兴趣的专家学者难以获取并利用博物馆的纸质相关文献。这种不利条件促使 UMAC 设立了电子期刊,由洪堡大学(University of Humboldt)主办《大学博物馆与收藏期刊》(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UMACJ)电子期刊开放网站。UMACJ 的主要内容仍是会议论文。网站还收录了早年多种会议论文,将有关大学博物馆的文章集中起来。网站的目标是向全球开放 UMAC 会议论文,实现资源共享。近期收录的会议论文集包括维也纳、曼彻斯特、旧金山、上海、里斯本、新加坡、里约热内卢和亚历山大市举办的年会,论文涉及大学博物馆与收藏的方方面面,及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和议题。

但在最近一段时间,发现期刊收录的文章也可以包括 UMAC 年会以外的研究成果。实际上,UMACJ 已经在出版 UMAC 年会以外的文章,包括例如根特大学(University of Ghent)2013 年主题会议“学术遗产的未来”(Future of Academic Heritage)中选取的文章。UMAC 年会的性质也在改变,例如,2014 年 UMAC 亚历山大市年会(2014 Conference in Alexandria)与国际博协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ction, CECA)联合举办。显然,随着大学博物馆事业的发展,UMAC 将会与其他国际博物馆协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自成立以来,UMAC 见证了一些国际博物馆与大学博物馆的争议问题。近年来,主流博物馆期刊刊发了越来越多有关大学博物馆与收藏的学术文章,以及许多专业出版人编辑的大学博物馆与收藏主题书籍。

很明显,高等教育日趋复杂的运营环境让大学博物馆与收藏受到了更多关注(Simpson 2014),关注不仅来自学术机构的高层领导,也有学者(教职员与学生)。现在的 UMAC 理事会将 UMACJ 的长期目标定位为大学博物馆与收藏领域内核心的学术期刊,这也是 UMAC 战略的一部分。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实施多个步骤,其中包括:将期刊收录文章范围扩大到 UMAC 年会之外,修改期刊编辑条款,扩充编辑成员等。UMACJ 的宗旨是建立作为学术出版人的公信力,吸引高质量投稿并成为大学博物馆主题文献的出版基地。未来的期刊中会有明显的重要变化。

现在,UMACJ 一如既往地从业务论文中挑选文章,出版论文集。本期(第 9 卷)的内容是关于 2016 年 UMAC 年会(2016 UMAC Conference),主题为“博物馆与文化景观”(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2016 年 UMAC 年会于 9 月 3—8 日于米兰举行,国际博物馆协会第 24 次大会(ICOM's 24th General Conference)也同时举行。本期最后一篇关于巴黎艺术与工艺博物馆的文章并没有在本次年会上发表,收录此文则表明期刊在朝着多样性变化发展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Simpson, A. 2014. Rethinking university museums: Material collections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Museums Australia Magazine*, 22(3): 18-22.



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米兰年会论文集： 博物馆与文化景观



古巴的大学文化遗产： 保护和发扬哈瓦那 CUJAE 大学文物收藏及 景观的方法体系

Carina Marrero Leivas / 文

陈力子 / 译

摘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大学都参与了大学文化遗产与未来的相关项目，而古巴正开始进行保护和发扬这类文化遗产。本文阐述了古巴的大学遗产的概貌，以及保护和发扬哈瓦那（Havana）的荷西·安东尼奥·埃切韦里拉大学（José Antonio Echeverría, CUJAE）校区文化遗产的方法体系。



引言

古巴是安地列斯群岛 (Antilles) 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屿, 位于佛罗里达海湾 (Gulf of Florida) 和尤卡坦半岛海湾 (Gulf of Yucatán) 之间, 首都哈瓦那, 居民人口约 200 万。古巴拥有丰富的历史、艺术、建筑、科技等遗产, 积累于以下历史时期: 西班牙殖民时期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1492—1898 年)、美国干政下的新殖民时期 (Neocolonial period) (1899—1958 年) 以及包括美国军事占领时期 (American military occupation) (1899—1902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的古巴革命时期 (Cuban Revolution) (1959 年至今)。

古巴共和国第 118 号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 (Law o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将国家文化遗产定义为由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文物组成, 是人类创造或自然演化的表现与证明, 具有考古学、史前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艺术、科学和普遍文化的相关价值¹。

在古巴, 人们对国家文化遗产抱有极大的兴趣。1977 年, 保护文化遗产的第一号法律² 随着国家文物登记制度的创建而发布。这一登记制度旨在建立、组织并监管被定为文化遗产的文化财产总目录³。1978 年, 在国家与地方遗迹的第 2 号法律⁴ 监管下, 国家历史遗迹委员会 (National Monuments Commission) 在哈瓦那成立。1995 年, 国家文化遗产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f Cultural Heritage) 成立, 目的在于保护、保存、修复、展示、研究和呈现文化与自然遗产, 并培训行业人员⁵。古巴境内遍布了数百座国家级、省级和地方博物馆, 均受到了古巴共和国国家博物馆体系 (National Museum System) 第 106 号法律保护, 该法律由国际博协古巴委员会 (ICOM Cuba Committee) 于 2009 年在哈瓦那颁布。虽然经济环境遭遇多年破坏, 但古巴在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喜人的。然而, 保护文化遗产依然任重道远。例如, 国内拥有丰富遗产的大学数目众多, 但与大学遗产相关的主题却得到极少关注, 且古巴也尚未对大学收藏和博物馆的保护和保存制定具体法律。大学遗产目前得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第 1 号法律和博物馆第 6 号法律的保护, 但后者仅对国家级、省级和地方博物馆作出了规定, 并没有任何条款考虑到大学收藏、博物馆或历史空间。

古巴的大学和大学文化遗产: 现状与可移动文物举措

古巴共有 60 所大学⁶, 遍布于全岛。第一所即现在的哈瓦那大学 (University of Havana), 成立于 1728 年 1 月 5 日, 全名为哈瓦那皇家及罗马教宗圣哲尼莫大学 (Royal and Pontifical San Gerónimo University of Havana)。自创立之日起, 该大学便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第三所大学, 拉丁美洲第 16 所大学 (Torres-Cuevas 2014)。1842 年, 皇家及罗马教宗机构不再具有罗马天主教 (Catholic) 性质, 这所大学便成为普通的殖民地大学, 更名为哈瓦那皇家文学大学 (Real and Literary University of Havana)。数年后, 在美国干政期间, 大学更名为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又称哈瓦那大学 (Torres-Cuevas 2014)。

1 Colectivo de autores, Protección del Patrimonio Cultural. Compilación de textos legislativos. Decreto 118, artículo 1.

2 查阅 <http://www.icom.ohc.cu/wp-content/uploads/2010/09/ley-1.pdf> (访问日期 2015 年 5 月 4 日)。

3 查阅 http://registracional.com/cuba/cuba_bienes_culturales.htm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4 查阅 <http://www.cnpc.cult.cu/comision-nacional-monumento> (访问日期 2015 年 5 月 4 日)。

5 查阅 <http://www.cnpc.cult.cu/quienes-somos> (访问日期 2015 年 5 月 5 日)。

6 Gustavo Cobreiro Suárez, "La Educación Superior y la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en Cuba" (哈瓦那大学校长会议,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2015 年 4 月 17 日)。



哈瓦那大学（图 1）几乎见证了古巴从西班牙殖民时期至今的全部历史，其历史和发展也与古巴寻求独立的国家特性和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尤其是 20 世纪前半叶。今天，该大学拥有 18 个院系和 14 个研究中心，致力于自然科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Núñez Jover & Baujin 2014）。



图 1

哈瓦那大学正门（2015）

Carina Marrero Leivas 拍摄

哈瓦那大学在 300 年间积累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建筑、文献、科学、学术和美学价值。某些可移动文物作为部分收藏并进入到菲利普·波伊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Felipe Poey）、蒙塔纳人类学博物馆（Anthropological Museum Montané）、弗拉瓜·玛西安那博物馆（Fragua Martiana Museum）、天文观测馆（Astronomical Observatory）和国家植物园（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植物标本馆中。

菲利普·波伊自然历史博物馆由古巴博物学家和科学家菲利普·波伊于 1842 年建立，当时的波伊是哈瓦那大学科学系主任和大学副校长。1939 年，博物馆搬迁至现今地址，大学校园内的一幢建筑内。该博物馆被认为是古巴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馆藏品约为 50 万件，包括动物、贝壳、化石、骨骼等标本，书籍、杂志和菲利普·波伊（Montero Cabrera & Alonso Bosch 2014）的手稿和原始图作。馆内展览都是与大学有关的科学人物以及生物系学生的研究作品。博物馆的使命是保护并增加大学所有的遗产，提升新生代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宣传资金资助大学文化遗产的重要性（Montero Cabrera & Alonso Bosch 2014）。

蒙塔纳人类学博物馆同样隶属于哈瓦那大学，1903 年由安东尼奥·巴奇列尔·莫拉莱斯（Antonio Bachiller y Morales）提议成立，他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提出了建立人类学博物馆的设想。在此基础上，那时的人类学系主任（Chair of Anthropology）路易斯·蒙塔纳（Luis Montané）教授提议创建这座博物馆，收藏与古巴境内、加勒比地区和美洲的前西班牙文化相关的考古文物。目前，该博物馆是“研究和考古展览的中心，在展示传统的延续性方面位居本国之首”⁷。

弗拉瓜·玛西安那博物馆是哈瓦那大学的第三座博物馆，成立于 1944 年。该博物馆位于旧圣拉萨罗采石场（San Lázaro Quarry），即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政治监狱所在地。这个地方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古巴的国家英雄霍斯·马尔特（José Martí）曾因其独立思想而被监禁于此。1996 年，此处因其历史价值被定为国家遗迹。该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大学附属的社区中心。

7 查阅 <http://fbio.uh.cu/mmontane.php>。



哈瓦那大学天文观测馆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该馆自 1939 年起坐落于校园内的菲利普·波伊楼中。天文观测馆展品来自法国、德国和美国，其可移动文物包括天文学、测地学和气象学仪器，以及馆内用于学术教育的材料。一个载玻片、行星和天体地球仪收藏成了教学用具的一部分，可用于大学高等教育和中小学课堂教学。此外，天文馆还有小型的书籍、名录和星表馆藏，藏品来自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法国和北美地区 (Montero Cabrera & Alonso Bosch 2014)。2008 年，该馆开始进行了修复，2013 年 7 月面向公众开放。在这历时 5 年的修复工作中，诸如时钟、气压计、风速计、教学用具、星象仪和望远镜等超过 150 年的收藏文物得到了保护 (Gómez Bugallo 2013)。数家机构也为此项目做出了贡献，齐力保护了具有科学和学术价值的文化遗产。

哈瓦那大学另一文化遗产是国家植物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其中包括了植物和菌类收藏。现今的植物标本馆藏来自哈瓦那植物园，位于 20 世纪早期建设的工厂建筑内 (in Spanish language: Quinta de los Molinos)。随后几年来，在大学植物学与地形学系主任菲利普·加西亚·卡尼萨雷斯 (Felipe García Canizares) 教授的征集下，馆内收藏不断增加 (Montero Cabrera & Alonso Bosch 2014)。1940 年代，安东尼奥·庞塞德里昂 (Antonio Ponce de León) 和一批学生组织成立了植物标本馆。数年后，随着 1959 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和国内大批教授的离去，植物标本馆内的文物遭遇重大变化。1966 年，该大学开始修复和回购工作，其成果便是现今的国家植物园植物标本馆，1968 年转移至大学内建筑。馆内所藏的植物和菌类标本是古巴重要的科学和文化遗产，是学者研究古巴自然多样性不可或缺的资料 (Montero Cabrera & Alonso Bosch 2014)。

此外在 1978 年，哈瓦那大学因其历史、环境、美学和建筑价值被定为国家历史遗迹 (National Monument)⁸。该大学拥有大批可移动文物，都是 3 个世纪历史的见证。然而，大部分艺术遗产集中在 20 世纪生产的物品中 (Felipe Torres 2014)，有画家画作、半身像、浮雕、马赛克画和古巴国内及国外雕刻师的古典考古学收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古巴画家阿曼多·加西亚·门诺克 (Armando García Menocal) 的帆布油画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放在玛格纳礼堂 (Aula Magna) 内，为医学、科学、文学、商学和司法等学科的教学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寓意。最具象征意义的雕塑作品无疑是“母校” (Alma Mater) (图 2)，由捷克斯洛伐克雕刻师 (Czechoslovakian sculptor) 马里奥·约瑟夫·科贝尔 (Mario Joseph Korbel) 于 1919 年用青铜雕成。



图 2
Alma Mater 的雕像
哈瓦那大学 (2015)
Carina Marrero Leivas 拍摄

8 查阅 <http://www.cnpc.cult.cu/patrimonio/162>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3 日)。



哈瓦那大学所有的珍贵文物都由文化遗产部 (Heritage Department) 进行管理。该部门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旨在监管、指导该大学所有的文化遗产, 并开展文物收藏研究, 编制馆藏库存名录, 制定宣传策略和采取不同措施以鼓励文化遗产研究。该部门是大学内管理、审批所有文化遗产保存、修复、转移或租借的领导机构⁹。

在哈瓦那大学保护大学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中,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遗产的研究, 文化遗产部正在将大学可移动文物进行项目整合¹⁰。最近的动态是在 2015 年和 2016 年举办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大学文化遗产研讨会, 由文化遗产部联同圣哲尼莫大学学院和 CUJAE 大学¹¹ 主办, 获得了古巴国内最重要文化遗产机构的支持。圣哲尼莫大学学院隶属于古老的哈瓦那大学,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 该学院为大学开设了“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课程。学院拥有一座小型的大学历史博物馆, 由原圣胡安·德·勒朗女修道院 (San Juan de Letrán, 哈瓦那大学设立之初的总部) 修复建成。

2016 年 9 月 15 日, 哈瓦那大学文化遗产部、大学文化遗产董事会与埃那雷斯堡大学 (Alcalá de Henares) 就双方的大学遗产举行过会议。今天, 该董事会正致力于让哈瓦那大学加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除了埃那雷斯堡大学、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墨西哥自治大学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加拉加斯大学 (University of Caracas) 和科英布拉大学 (University of Coimbra)¹² 以外的第六所世界遗产大学。

古巴的第二所公办大学是东方大学 (Eastern University, in Spanish language: Universidad de Oriente), 于 1947 年在古巴圣地亚哥省 (Santiago) 成立 (图 3)。之所以强调这所大学的公办性质, 是因为在 1947 年以前, 由于第 16 号法律“公办大学法” (Law of Official Universities), 古巴几乎没有保留私立大学, 正是在该法律下东方大学和圣塔·克拉拉的玛尔塔·阿伯大学 (Marta Abreu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才得以成立 (Pérez Franco 1996)。与哈瓦那大学一样, 东方大学见证了美国干政时期下的古巴历史。该校师生积极参与了反对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将军独裁专制, 以至于巴蒂斯塔亲自下令封锁大学教室。1959 年 1 月, 随着卡斯特罗古巴革命的胜利, 大学重新向师生开放。从 1947—1958 年, 东方大学拥有 5 个院系: 教育学、哲学与文学、法学、商学和工业化学工程¹³。时至今日, 该大学已有 11 所院系和 13 个研究中心¹⁴。

图 3

东方大学的校长办公楼 (2011)

Carina Marrero Leivas 拍摄



9 查阅 <http://portal.fayl.uh.cu/patrimonio> (访问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10 查阅 <http://portal.fayl.uh.cu/patrimonio> (访问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11 查阅 http://www.unesco.org/new/es/media-services/single-view-tv-release/news/se_inaugura_en_la_habana_primer_seminario_de_patrimonio_cultural_universitario/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4 日)。

12 查阅 <http://www.uh.cu/node/3356> (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18 日)。

13 查阅 <http://www.uo.edu.cu/historia/>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14 查阅 http://www.uo.edu.cu/documentos/libro-historia-27_uo.pdf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东方大学成立几年后又建成了 3 座博物馆用于保存可移动文物。第一座博物馆建于 1952 年，是为纪念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博物学家查尔斯·拉姆斯登 (Charles T. Ramsden de la Torre) 而设的查尔斯·拉姆斯登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harles Ramsden)。1951 年拉姆斯登去世后，其家人将其部分收藏捐赠给东方大学。由此，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一间展览室、一间研究室和档案室开始，保存着 15 180 份动物标本和古巴最大的蝴蝶标本之一，藏品凝结了拉姆斯登一生的智慧成果 (Carlos Naranjo & Lauranzón Meléndez 2012)。许多学生和教授并不知道这座博物馆的存在，而博物馆在保护现今可移动文物和建筑方面至为关键。目前博物馆的经营状况惨淡，挣扎于空间不足、储藏设备年复折损、自身价值也逐渐削弱的困境当中。东方大学还拥有一座考古学博物馆 (Museum of Archaeology) 和大学历史博物馆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均处于困境之中，这对过去半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带来了威胁。桑梭·费尔南德斯 (Sansó Fernández) 认为，这些博物馆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造成此种境况的原因有几个，尤其是博物馆专职工作人员的缺失 (Sansó Fernández 2003)。费尔南德斯的研究发表于 2003 年，这意味着大学博物馆和东方大学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现的。

1952 年，拉斯贝拉斯 (Las Villas) 的玛尔塔·阿伯中央大学 (Marta Abreu Central University) 在古巴中部建立 (图 4)。该大学是古巴的第三所大学，在第 16 号法律“公办学法”的框架下成立。目前，该大学拥有 12 个院系和 33 个学术项目，涵盖人文、自然和技术科学等学科。该大学为卡斯特罗革命历程中的历史人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设立了一座小型博物馆，而切·格瓦拉本身与该大学关系也十分密切。博物馆所在的房间就是 1958 年圣塔克拉拉战役 (battle of Santa Clara) 前切·格瓦拉的指挥所。博物馆开放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展品均为关于切·格瓦拉以及其他参与解放圣塔克拉拉战役、古巴革命胜利的革命成员的照片。展览还展出了该大学历史性时刻的图片，以及 1959 年教育学系授予切·格瓦拉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始照片。



图 4

拉斯贝拉斯的玛尔塔·
阿伯中央大学 (2012)

José A. Chávez Hernández 拍摄

该大学拥有一座占地 10 公顷的植物园，其兼具科学、历史和环境研究价值。2009 年，古巴国家遗产委员会 (National Heritage Council) 将玛尔塔·阿伯中央大学定为国家历史遗迹 (National Monument)，作为古巴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建筑案例以及科学机构 (García Santos 2009)。

15 查阅 <https://magnetismocnea.wordpress.com/2015/05/06/llaman-al-rescate-de-museo-de-historia-natural-durante-primera-jornada-del-foro-de-comunicacion-de-las-ciencias/>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16 查阅 <http://www.uclv.edu.cu/>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8 日)。

17 查阅 <https://cheguiajejemplo.wordpress.com/2014/04/10/dedican-al-che-sala-de-historia-de-la-universidad-central-de-lasvillas/>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8 日)。

18 查阅 <https://cheguiajejemplo.wordpress.com/2014/04/10/dedican-al-che-sala-de-historia-de-la-universidad-central-de-lasvillas/> (访问日期 2015 年 6 月 28 日)。



古巴，尤其是首都哈瓦那市内，还有其他有名的大学。例如，成立于 1962 年的国家艺术学院（National Schools of Arts, ENA）和成立于 1976 年的高等艺术学院（Higher Institute of Art, ISA）（图 5）。这两个学院均由意大利建筑师罗伯特·戈塔尔迪（Roberto Gottardi）和维托里奥·加拉蒂（Vittorio Garati）以及法籍古巴裔的里卡多·保罗（Ricardo Porro）设计建造，2013 年 2 月被古巴共和国政府定为国家历史遗迹，代表了 1960 年古巴现代建筑运动¹⁹的建筑和城市价值（Lisfalcón 2015）。



图 5

国家艺术学院（ENA）

图片来源：<http://bechtler.org/Learn/Events/details/modernism-film-22>

其他案例包括建于 1964 年的 CUJAE，建于 1976 年的高等理工学院（High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以及最近 2002 年新建的计算机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Computer Sciences, UCI）的校区。这些新的大学建筑工程由国内外重要的艺术家完成，校园建有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雕像。

案例分析：CUJAE 理工学院校区中的可移动文物及其现状

CUJAE 理工学院校区位于西哈瓦那市玛利亚瑙自治区（Marianao），始于 1900 年的哈瓦那大学工程师、电气师与建筑师学院。数年后，该学院成为哈瓦那大学技术系（Faculty of Technology）。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政府采取了若干举措振兴国家的教育事业。1961 年，由哈瓦那大学工程系和建筑系成立的技术系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学不断增加的学生，因而必须扩建校区，更新设备。这就是为什么在 1960 年 9 月，卡斯特罗宣布建设新大学，即荷西·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大学校区，简称 CUJAE。1964 年建成了 5 座建筑后，该大学的校区落成。1976 年，随着高等教育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的成立，CUJAE 大学校区增设了荷西·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高等理工学院（High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José Antonio Echeverría, ISPJAE）（图 6）。



图 6

荷西·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大学校区的高等理工学院（CUJAE）（2012）
Carina Marrero Leivas 拍摄

19 查阅 http://www.unesco.org/new/es/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conjunto_de_escuelas_de_arte_de_la_habana_monumento_nacional/#.V_Ulo4-LTIU（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18 日）。



如今，ISPJAE 被认为是古巴技术科学的重要中心，校区和哈瓦那国家艺术学院一样，因其建筑和城市价值，成为 1960 年代古巴现代建筑运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ISPJAE 拥有 7 个院系和 9 个研究中心，每个院系和研究中心都收藏有可移动文物。这意味着不仅最古老的大学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新院校也同样拥有，因为大学不断地产生有价值的资产。在 CUJAE 长达 52 年和 ISPJAE 长达 42 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具有历史、学术、科学技术、艺术和文献价值的文化遗产。2006 年，该大学的拓展部（Extension Department）设立了文化财产名录，收集校区不同部分的文化遗产以便辨认。自本研究起，9 件文物被古巴国家文化资产档案局（National Office of Cultural Assets Records of the Republic of Cuba）确定为大学和国家文化遗产（Portero Ricol & Marrero Leivas 2012）。这些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展示在 CUJAE 唯一的大学博物馆内，有的文物极具重要的历史价值，有关于大学建筑、大学校区落成和 ISPJAE 建立的历史。也有因大学的成功而获得的文物，诸如奖品、证书、奖牌、奖杯等。但大学的博物馆环境并不很好，现位于高级行政大楼一个小房间里。如今，因为博物馆年久失修，尤其是漏水的困扰，展览空间已对公众关闭。

另一方面，建筑系主任办公室藏有小型雕塑，由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创作并捐献给中心。自哈瓦那大学建筑系有史以来，建筑系拥有超过 100 年历史的家具原件（图 7）。然而这些资产也没有得到维护和保护，保存状况堪忧。其中一些被用作普通家具，历史价值未见于众。



图 7

可移动的文化遗物放置在建筑系：
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的雕塑、
哈瓦那大学建筑系建系以来的家具、
属于建筑师和作家 Joaquin Weis
的椅子（2012）
Carina Marrero Leivas 拍摄

著名古巴艺术家的作品，如荷西·安东尼奥·迪亚兹·帕雷兹（José Antonio Díaz Peláez）的雕塑作品“瑞兰帕高”（Relámpago）、劳尔·马尔蒂内斯（Raúl Martínez）装饰大学景观的壁画作品“早晨的波尔”（Por un mañana）等，大部分此类可移动文化遗产都完全融入到大学校园的建筑和整体景观当中。



该大学的所有可移动文物应该获得更多的价值，鉴于它们隶属于一所享有国内外盛名的高等学府，也因为它们是 CUJAE 城市建筑的一部分，经历过古巴革命的洗礼，是建筑理念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必须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可移动文物，不仅考虑其作为物品、著名艺术家作品的价值，也要考虑物理环境、景观和历史、所属地，以及长年积累下的文化价值。

遗憾的是，CUJAE 的文化遗产面临若干严重问题，如缺少保护和宣传的活动。2010 年，该大学成立了 CUJAE 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组（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UJAE Cultural Heritage, GPCC），其现任的主任建筑师阿达·埃斯特·波特罗·里克尔（Ada Esther Portero Ricol）教授在当时为此奔走呼吁，组织 3 位专家负责宣传、保护及保存大学所有的文化遗产。但与许多其他的教育机构一样，CUJAE 校园和研究所、ISPJAE 校区内分散着未知的文化资产，系所、部门、办公室、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内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文化遗产。考虑到大学并不是在 1964 年校区落成时建立，而是数年前在哈瓦那大学内成立的，许多文物还留在前身学院内，现在变成了物理学系。因此，保护组肩负着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是保护、保存并宣传已知的大学文化遗产；其次是寻找、发现未知的文化遗产以便未来的保护、保存和宣传。

自创立以来，保护组已经与大学社区共同展开实际工作，包括撰写有关战争和（或）自然灾害中保护大学文化遗产的文献研究，为整个大学社区参与设计、应用不同的活动等。2012 年，专家们与哈瓦那文化遗产省级主管一同完成了将 CUJAE 校区定为国家遗迹或保护区（National Monument or Protection Zone）的文件（Portero Ricol & Marrero Leivas 2012）。有必要强调的是，古巴国家遗迹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古巴分会（ICOMOS-Cuba Committee）在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对 CUJAE 校区的极大兴趣，因为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校区的价值，尤其是建筑和社会的价值。

调查

本文提及的工作由 CUJAE 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组完成，其中笔者也在 2011—2013 年作为保护组成员参与工作。

2011—2012 年间，对 CUJAE 校区内已知的文化遗产做了检查与调查，并据此制出数据表。其中发现的问题有：

- （1）储藏室等保存文化遗产的空间不足，保存环境堪忧，其中还有古巴文化财产名录上的文物；
- （2）部门和办公室中的文物没有任何保护和宣传的措施；
- （3）大学官方对可移动文化财产保护保存关注的缺失。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在 2013—2014 年间，该大学社区中的 271 人（官方、教师、研究者、学生和雇员）共同协作完成了此次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图 8）：

- （1）60% 的受访者不知道大学校区内的可移动文物是什么；
- （2）68% 的受访者不知道有可移动文物被定为大学和国家文化遗产；
- （3）71% 的受访者忽略了这些文化资产记入名录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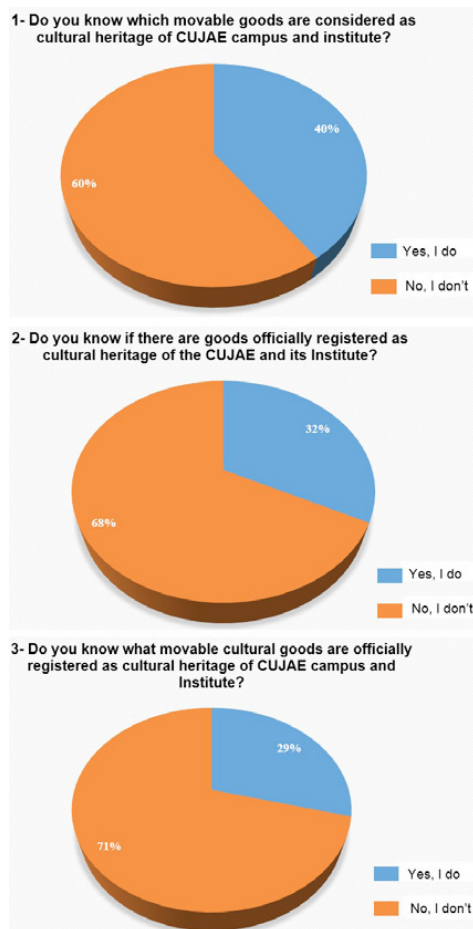


图 8

调查的问题和答案

Carina Marrero Leivas 制定调查
计划

调查问题与回答

这些结果显示，较高比例的受访者对文化遗产持忽略态度，原因在于大学文化遗产由于官方的不重视而缺乏宣传。大学社区对校内遗产的忽视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因为没有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就几乎不可能保存遗产，而这就是 CUJAE 校区和古巴大部分大学所面临的问题。



这就是为何提议制定保存、宣传 CUJAE 大学校区可移动文物方法体系的原因²⁰，并参考了目前古巴国内的研究趋势，哈瓦那大学和欧洲的三个案例研究²¹。

方法体系

从 CUJAE 校区大学文化遗产的现状出发，极有必要对多年来被忽视的遗产采取措施。

考虑到欧洲和古巴大学保存宣传的趋势，以及 CUJAE 目前的现状，策略路线得以确立。这些路线是方法体系的起点，也是计划实施的一部分。本研究提议的第一个策略是 CUJAE 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组负责应用方法体系，并指导后续设计的所有措施的执行。目前，保护组由 3 位建筑师（两名教师和一名技师）组成。教师隶属于大学拓展部教学部门和建筑学系。因此，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保护组的工作。所以，首先有必要的是为保护组增加全职工作人员，即不担负教学任务的专家和研究者。并且，还必须保证在现在或未来的博物馆内设置固定的办公地点，能够接待每日学生、教授、研究者和其他感兴趣观众来访。

在强化职员配置后，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对评估、编目、清点和登记文物等方面参考专家和国家层面的国家遗产委员会、文化遗产省级部门（Provincial Chair of Cultural Heritage）和国际博协古巴分会（Committee of ICOM Cuba）的建议后做出重要决策。大学社区也要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中来，包括所有与大学案例分析有关的官员、教授、研究者、学生和行政职员，服务也非常重要。而且，更多普通公众的参与将会适当强化大学和社区或城市的联系，国内外的交流是值得考虑的另一项策略。让人们了解大学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非常关键，保存和开发文化遗产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始教育 ISPJAE 的高层人员，进而这些官员、教授和研究者们可以影响学生。藉此，向官员们表明保护宣传大学文化遗产对大学未来的重要性。

另一项策略是创建管理制度筹措资金，利用大学资源和潜力，例如实施项目和国际会议，从 ISPJAE 对外传播古巴技术与科学；利用及租借休闲场所，如剧院、运动场。此策略目的在于带动科学旅游业，并且重要的是，将 ISPJAE 及其校园变成参观胜地，吸引国内外观众来了解超过一个世纪的古巴工程和建筑的历史、目前取得的成果、未来的项目，以及 CUJAE 在 50 年来的丰富历史。

20 这一方法体系基于目前在某些欧洲和古巴大学的研究。本研究开展以来，我们分析了大学文化遗产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辨识出目前欧洲在保存和宣传大学文化遗产方面的举措，以三个大学为分析案例；我们建立了研究的变量，对比了三个大学的情况；我们分析了古巴国内大学文化遗产的现状，也对 CUJAE 大学校区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检视和总结。

21 为了解欧洲大学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宣传举措，我们对三个大学不同的实验也进行了研究：帕多瓦大学、康普顿斯大学和里斯本高等技术学院。为研究这三所欧洲大学的举措，考虑到帕多瓦大学和康普顿斯大学拥有博物馆数量众多，我们也研究了两所大学各自的两座博物馆。里斯本高等技术学院则选取了三座包含大学文化遗产机构的博物馆。在完成访谈，实地参观博物馆和查阅文献后，我们根据研究变量对三个欧洲案例进行了对比，从对比结果中总结出欧洲大学可移动文物保存和宣传的优势及劣势，应用到设计 CUJAE 大学校区的方法体系上。



在提议的策略基础上，方法体系各阶段如下：

1. 搜寻可移动文物，调查研究整个 ISPJAE 及其校园内隐藏的可移动文物。考虑到该校源自哈瓦那大学这一重要的背景，因此第一阶段包括调查该校前身，即工程师、电气师和建筑师学院与科技学系。重要的是从多学科视角调查校园所有区域，包括院系、部门、办公室、教室、工作坊、实验室、堆积物、档案馆等。

2. 信息收集和评估。涉及实现信息收集和广泛调研已知财产，使用文献和口耳相传的资料；随后专家委员组评估文物并挑选出 ISPJAE 的可移动文物。

3. 编目、清点和登记。编目和清点所有定为 ISPJAE 可移动文物的文化资产；编目和清点工作依照古巴文化部国家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官方文件；随后，文化资产必须记入大学内部管理的登记簿。

4. 提升知识储备并对那些不了解文化遗产的大学社区员工进行培训；此外还要让附近的人群也获得知识。这一阶段是方法体系最庞大、最具挑战的部分之一，主要目的在于对特定工程师社区的相关文化遗产教育。

5. 保护和宣传项目以及实施修复、保存所有文化资产和景观（所有建筑和城市大学）。

本阶段的提议：

（1）创建虚拟展览或网页，传播大学可移动文物，作为中期阶段的一步。

（2）创建大学博物馆，展出新的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将被用在哈瓦那工程和建筑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当中，此为长期阶段。

（3）确保有关 ISPJAE 和 CUJAE 大学校园文化遗产的文化宣传项目。

这一方法体系不仅可在本案例中应用，也适用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

讨论

若干问题影响着古巴的大学文化遗产，主要问题来自于经济方面。鉴于古巴仍然受困于 1960 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封锁，该封锁影响渗透至大学，使其缺少社区日常活动发展的基本资源。这一情况意味着大部分大学没有获得保护宣传文化遗产的预算，官方并不认可文化遗产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许多大学文化遗产都被忽略，大学社区对其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大约 6 年以前，位于首都的大学已经采取有利于文化遗产的措施，包括哈瓦那大学和 CUJAE 校区。



对比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来看,虽然古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但欧洲的博物馆研究,如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ova)、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和里斯本高等技术学院(Technical Lisbon Superior Institute)等的案例研究证明,保护宣传文化遗产方面,它们的优劣势与古巴大学情况近似,例如都要通过建立保护组或部门来负责保护、发扬大学文化遗产。一个直接影响大学文化遗产的普遍问题是,其保护和宣传维度依赖于小部分人而非整个大学社区。大学官方与大学遗产的关系通常是割裂的,保护过程也因缺少经济财力资源、不受重视而进展极其缓慢。

CUJAE 被定为国家历史遗迹,ISPJAE 大学博物馆的建立和修复保护可移动文物,都讲述着哈瓦那技术科学的历史,采用着本文提议的方法体系。期待 ISPJAE 和 CUJAE 也能吸引到公众的目光,让大学社区能看到文化遗产。要成功保护、宣传大学文化遗产,就不能将其视为过去的一个物品,而是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动力引擎。

致谢

本研究是 2011 年在古巴启动,并于 2013—2015 年在欧洲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由技术、遗产、工业领域的 Master Erasmus Mundus TPTI (Techniques, Patrimoine, Territoires de l'Industrie) 协助完成。我非常感谢 Sofia Talas、Marta Lourenço、Ada Esther Portero Ricol、Giovanni Luigi Fontana 和 Isabel García Fernández。感谢在欧洲和古巴所有接受采访的博物馆专家和策展人。

参考文献

Colectivo de autores, Protección del Patrimonio Cultural. Compilación de textos legislativos. Decreto 118, artículo 1.

Felipe Torres, C. 2014. Al abrigo del Alma Mater: obras de arte en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In: El patrimonio cultu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d. C. FELIPE TORRES & J. A. BAUJIN (La Habana: Editorial UH).

Felipe Torres, C. Patrimonio Cultural Universitario, Facultad de Artes y Letras,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http://portal.fayl.uh.cu/patrimonio> (accessed July 15, 2015).

García Santos, N. 2009. Declaran Monumento Nacional a 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 Juventud Rebelde, Diario de la Juventud Cubana, Edición digital. <http://www.juventudrebelde.cu/cuba/2009-11-16/declaran-monumento-nacional-a-la-universidad-central-de-las-villas/>.

Lis Falcón, N. 2015. Memoria atesorada: Patrimonio Cultural Universitario. Revista Alma Mater.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http://www.almamater.cu/revista/memoria-atesorada-patrimoniocultural-universitario> (accessed Septiembre, 2016).

Montero Cabrera, L. A. & R. Alonso Bosc h. 2014. El patrimonio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n las ciencias naturales y exactas. In: El patrimonio cultu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d. C. Felipe Torres & J. A. Baujin (La Habana: Editorial UH).

Naranjo López, C. & B. Lauranzón Meléndez & P. Aportela Gilling. 2012. Mariposas diurnas (insecta: lepidoptera) en la Colección Charles T. Ramsden de la Universidad de Oriente en Santiago de Cuba, Ciencia en su PC, N. 1. <http://www.redalyc.org/articulo.oa?id=181324066009> (accessed June 25, 2015).

Núñez Jover, J. & J. A. Baujin. 2014.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como institución de conocimiento. In: El patrimonio cultu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d. C. FELIPE TORRES & J. A. BAUJIN (La Habana: Editorial UH).

Pérez Franco, D. 1996. Los estudios de ingeniería y arquitectura en La Habana La Habana: Ediciones ISPJAE.

22 更多内容参见: “Le patrimoine culturel universitaire: une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servation et la valorisation des biens culturels mobiliers. Le cas de l’ Instituto Superior Politécnico José Antonio Echeverría à la CUJAE – La Havane”, by Carina Marrero Leivas, master’s thesis of Erasmus Mundus program (TPTI Master – Techniques, Patrimoine, Territoires de l’ Industrie), University of Padua, 2015. <http://dspace.uevora.pt/rdpc/handle/10174/18723>.



Portero Ricol A. E. & C. Marrero Leivas . 2012. Expediente. Propuesta Monumento Nacional-Zona de Proteccion. La Habana.

Torres-Cuevas , E. 2014. Itinerario de un alma mater. In: El patrimonio cultur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d. C. Felipe Torres & J. A. Baujin (La Habana: Editorial UH).

Sansó Fernáández. 2003.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de Oriente: pasado, presente y futuro, s.l, s.d.

Bienes culturales en Cuba - Registro Nacional de Bienes Culturales. http://registronacional.com/cuba/cuba_bienes_culturales.htm (accessed June 3, 2015).

Comisión Nacional de Monumentos” , en Portal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Patrimonio Cultural. <http://www.cnpc.cult.cu/comision-nacional-monumento> (accessed May 4, 2015).

Conjunto de Escuelas de Arte de La Habana: Monumento Nacional. Servicio de prensa. UNESCO, 2013. http://www.unesco.org/new/es/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conjunto_de_escuelas_de_arte_de_la_habana_monumento_nacional/#.V__XUI-LTIV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6).

Dedican al Che sala de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 <https://cheguiayejemplo.wordpress.com/2014/04/10/dedican-al-che-sala-de-historia-de-la-universidad-central-de-las-villas/> (accessed June 28, 2015).

Facultades, Universidad de Oriente. <http://www.uo.edu.cu/historia/> (accessed June 25, 2015).

Ley No. 1 Ley de Proteccion del Patrimonio Cultural, Edición ordinaria, Número 29, La Habana, 1977. <http://www.icom.ohc.cu/wp-content/uploads/2010/09/ley-1.pdf> (accessed May 4, 2015).

Llaman al rescate de Museo de Historia Natural, durante primera jornada del Foro de Comunicacion de las Ciencias, Magnetismo Aplicado. <https://magnetismocnea.wordpress.com/2015/05/06/llamanal-rescate-de-museo-de-historia-natural-durante-primera-jornada-del-foro-de-comunicacion-de-lasciencias/> (accessed June 25, 2015).

Museo Montane, en Facultad de Biología (accessed June 23, 2015) <http://fbio.uh.cu/mmontane.php> Portal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Patrimonio Cultural: ¿Quiénes somos? <http://www.cnpc.cult.cu/quienes-somos> (accessed May 5, 2015).

Se inaugura en La Habana Primer Seminario de Patrimonio Cultural Universitario, UNESCO, Servicio de Prensa. http://www.unesco.org/new/es/media-services/single-view-tv-release/news/se_inaugura_en_la_habana_primer_seminario_de_patrimonio_cultural_universitario/ (accessed June 24, 2015).

Universidad Central “Marta Abreu” de Las Villas, en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 <http://www.uclv.edu.cu/> (accessed June 28, 2015).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en Patrimonio Cultural Consejo Nacional de Cuba. <http://www.cnpc.cult.cu/patrimonio/162> (accessed June 23, 2015).

Universidad de Oriente: Hitos de sus 60 años de historia, Departamento de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de Oriente. http://www.uo.edu.cu/documentos/libro-historia-27_uo.pdf (accessed June 25, 2015).

联系方式

Carina Marrero Leivas, Architect (2007), Master in Social Housing (2010), Master in Historic Sciences (TPTI- Techniques, Patrimoine, Territoires de l'Industrie) (2015)

Guide of Museum of History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Padua)

Address: Museum of History of Physics, Via Francesco Marzolo, 35131 Padua PD, Italy

E-mail: architect.cml@gmail.com

关键词

Cuba, Academic Heritag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trategies



大学博物馆的收藏： 德国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

Cornelia Weber, Martin Stricker / 文
陈力子 / 译

摘要

大学博物馆是国家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 的重要部分, 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景观。在中央门户网站的帮助下, 德国大学博物馆的面貌得以在全世界展现。最近, 德国的大学博物馆藏品协调中心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University Collections) 采用门户网站的数据, 设计出大学博物馆基本信息的关键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帮助调查、总结并界定大学博物馆的战略出发点, 促进合作, 鼓励战略联盟的形成。

本文将介绍大学博物馆关键指标所带来的潜在价值。



引言

2006 年 7 月于意大利米兰 (Milan) 举办的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年会 (General ICOM/ UMAC Conference) 上, 与会者就博物馆和文化景观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大会主题是“博物馆和文化景观” (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而文化景观即由人类行为影响或塑造的景观²。

据此定义, 首先可以认为某类大学收藏品, 如植物园、地质公园或雕塑公园等, 都是大学文化景观, 因为这些都是人类专门创造和设计建造的。大学校园和博物馆, 或是收藏所在的建筑也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景观。希望在本文能深入辨析, 将大学博物馆和收藏作为重要的文化景观, 并将其作为国家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远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定义, 此处对“文化景观”的理解是广义的, 其中包括个人和社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文化行为。将此广义的定义运用到德国大学博物馆上, 地方、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情况也同样适用。

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 大学博物馆的创建和发展从多方面、多维度地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状态。在地图上标出大学博物馆后, 得到了目前博物馆的分布图。如果考虑到每座大学博物馆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 反映地方和世界社会与政治的变化, 这幅地图就变成了更为有趣和复杂的文化景观了, 其中包含了不同时空下的认知、文化和社会。

为了强化大学博物馆的现代角色, 这一景观需要深入地研究, 记录下其多重维度和关系。编辑的信息越多, 大学博物馆作为国家遗产的身份感就越清晰明确。并且, 越了解这一景观, 就越能设计、定义并细化战略出发点, 促进合作, 鼓励战略联盟。



图 1
大学藏品的地理分布概况

1 ICOM/UMAC 大会, 意大利米兰, 2016 年 7 月。

2 关于文化景观, <http://tclf.org/places/about-cultural-landscapes> (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德国的大学博物馆景观

要将一种文化景观以形象化的最简单方式来呈现,其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可行的数据绘制地图。如今,在德国的大学博物馆藏品协调中心运营的中央门户网站协助下,德国大学博物馆的景观概貌得以在全世界面前呈现。

协调中心的目标是进一步发展、整合德国大学博物馆³作为独立研究、教学教育基础设施,并在交叉的跨学科基础上,适当考虑它们的多样性和具体的地方特性⁴。

国家大学博物馆门户网站⁵展示了一系列作为科学和学术基础设施的大学博物馆资讯,也有关于博物馆本身、参与其中的人员和机构,以及研究、发展历程和展览活动等信息。

国家门户网站背后的理念,是将学术博物馆以数字化形式服务于现在的研究、教学和公共教育。网站的建成已经带来了良好的效果,使大型的研究型博物馆和小型的学术型博物馆之间达成了重要的合作关系。

2016 年 7 月,门户网站收录了来自 82 所大学 989 项收藏品并对外公开。为了发展这一景观,有必要将收藏品的描述与不同的地理资料、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理联系起来,如城市、州等。

德国的大学及其博物馆隶属于州,德国地图包括 16 个州,描绘出 82 个不同大小的圆圈⁶,每个圆圈代表了一所拥有收藏品的大学。小圆圈代表了少于 10 项收藏品的大学,中圆圈代表有 10~20 项收藏品的大学,大圆圈代表超过 20 项收藏品的大学。用户点击圆圈时就会出现更多关于大学和收藏品的信息。

关键指标

如果要总结德国大学博物馆文化景观和基本情况的特性,就必须设计并使用关键指标。关键指标是一组可量化的评估元素,用以分析可用数据并协助判断目前大学博物馆的基本情况。

大学博物馆在不断发展,而设定关键指标则能够帮助明确特定时期的特定博物馆相关发展变化,并对各大学结果进行比较,如机构设置、建筑状况等。关键指标还有助于对博物馆潜力及其可用性进行确切的评估,因而能帮助关键人员制定策略,强化博物馆的文化科学角色,为未来赢得战略伙伴,启发未来的博物馆政策。

3 参见 <http://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 (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4 Cornelia Weber, Sarah Link, Martin Stricker, Oliver Zauzig: 《将大学馆藏重新定位为科学基础设施,德国的新方法》(Repositioning University Collections as Scientific Infrastructures. A New Approach in Germany)。引自 Gudrun Wolfschmidt 编:《加强大学文化遗产研究》(Enhancing University Heritage-Based Research),汉堡,2016 年,第 31—43 页(Nuncius Hamburgensis -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33)。

5 <http://portal.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 (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6 德国共有 107 所大学(2015/16)。



图 2
集中协调大学的藏品

德国大学博物馆基本情况

现在，24 所德国的大学集中协调他们的博物馆收藏品，这占据了德国博物馆 72% 的资源。集中协调意味着博物馆由定期会面的工作组、委员会，或是负责大学政策、战略和活动的博物馆官员进行协调，另外还有其他 4 所大学正在讨论博物馆官员的聘用问题。2012 年，协调中心首次开始运营时，只有少数大学集中协调他们的博物馆。

考虑到博物馆工作应该以清晰、可靠的政策作为基础，大学必须为博物馆制定政策，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只有 4 所德国大学已经制定并开始实施博物馆政策，一些大学还在制定过程中。27 所大学在自己的网站上展示了收藏品、博物馆和遗产，62.5% 的大学收藏品处于开放状态。这意味着，收藏品得到了维护，并且 / 或者可以访问，并且 / 或者参与到了活动当中。6.9% 的大学收藏品不开放，30.6% 没有回应调查。

Sammlungsarten

Die Kategorie Sammlungsart, die den Bestand und den inhaltlichen Schwerpunkt einer Sammlung charakterisiert, ist aus dem Museumsbereich übernommen. Sie wurde jedoch – in Anlehnung an die UNESCO-Klassifikation – für den Bereich der akademischen Sammlungen entsprechend modifizi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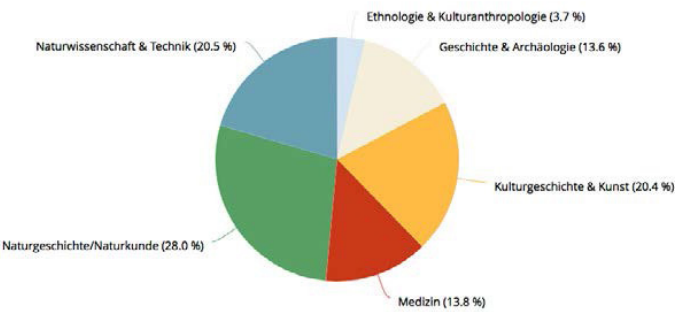


图 3
学科领域

大学博物馆按照主题进行分类，分布比例情况如下：

- (1) 自然历史 28.0%
- (2) 文化历史与艺术 20.4%
- (3) 自然科学与技术 20.5%
- (4) 医学 13.8%
- (5) 历史考古 13.6%
- (6) 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 3.7%

除了德国国内的一般情况以外，也为每个州展示了同样的关键指标。德国的高等教育由州财政支持，因而这是相当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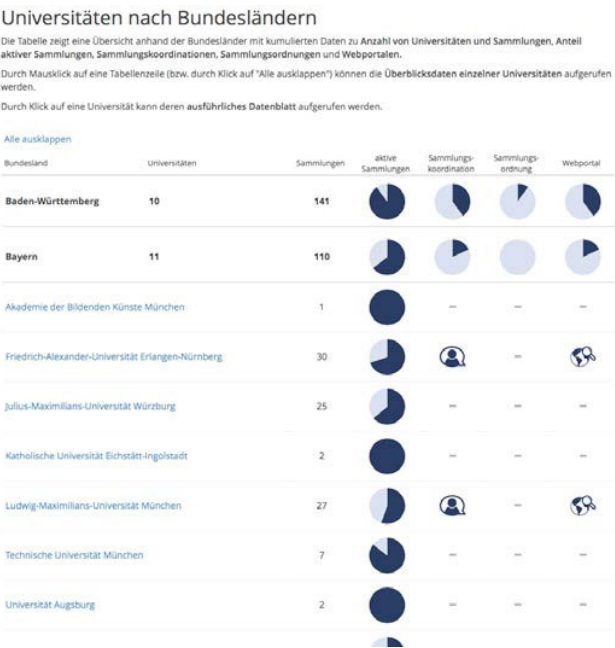


图 4
各州的大学（藏品）统计

点击具体的州，如巴伐利亚（Bavaria），就会出现每个大学收藏品的信息。巴伐利亚有 11 所大学，总共拥有 100 项收藏，其中 30 项隶属于埃尔朗根 - 纽伦堡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再点击纽伦堡大学，就会出现以下有关大学收藏品的信息：

- (1) 地址
- (2) 收藏品数量
- (3) 开放的收藏品数量
- (4) 管理官员或联系人信息
- (5) 现行大学博物馆管理政策信息
- (6) 大学收藏品综合展示网络信息
- (7) 学科收藏品数量

大学网页补充了所有收藏品的列表，包括收藏品的开放情况（开放、不开放、未知），联系人信息和综合出版物（若有的话）。大学的关键指标在网站上链接了收藏品的更多细节信息（如主题、展品类型、数据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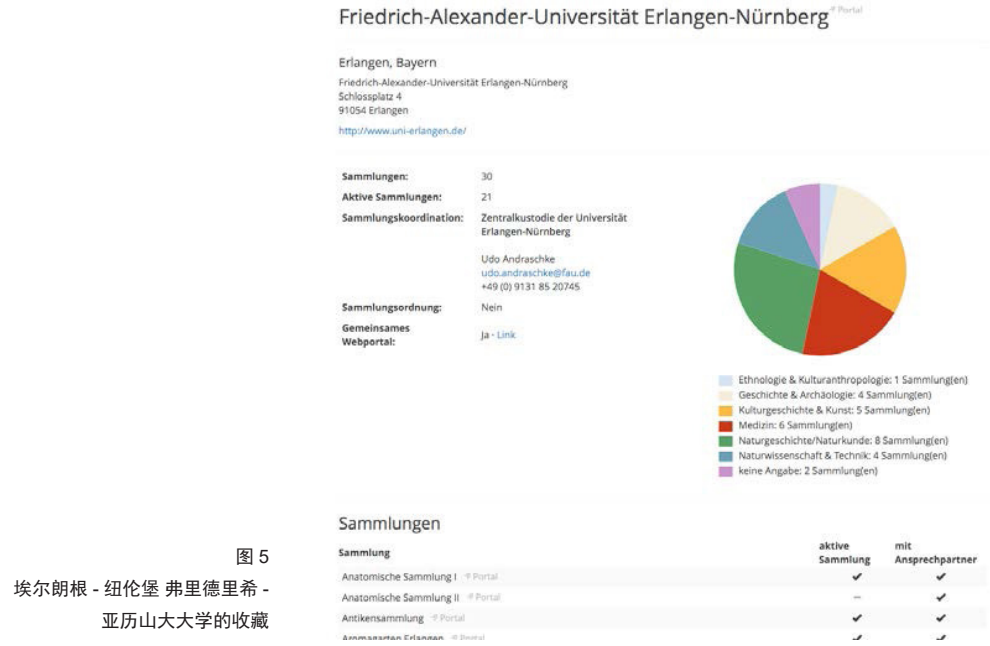


图 5
埃尔朗根 - 纽伦堡 弗里德里希 -
亚历山大大学的收藏

深入分析

大学博物馆应该是数字化公开并且可共享的，因此协调中心为数字博物馆设计了关键指标⁷，分析了数字化的一般水平、每种收藏类型、学科的数字化的程度，并且还分析了数字复制的类型（如图像、音频、视频、3D、动画、文本等），及其作为科学用途的有效性。利用这些信息，得以与社区合作，为大学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设计策略和特别项目。

下一步，协调中心将收集教学活动的资料。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博物馆在学术教学中的角色。例如，博物馆是否长期为教学活动服务？哪个学科的课程大纲包含了使用博物馆进行教学？

结语

在德国，将大学博物馆视为一种景观和独立研究、教学和教育设施，已被证明是可行的。对这种景观了解越多，就越能够研究、发现并定义战略出发点，促进合作，鼓励战略联盟。

因此，本文对博物馆收藏进行研究和记录，并在关键指标的帮助下分析了可用资料。有了这些结果，就能设计具体的战略，确保博物馆的长久存在和使用。

为增进大学博物馆对研究、教学和教育的可及性和可用性，有必要收集、呈现相关的资料。这对于大量而隐藏的学科收藏品来说尤其重要。例如，这些大学博物馆能带来大型的研究型博物馆和小型的学术型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因此鼓励全球的大学和国家进行收藏品系统调研，分析可用资料并制定基本政策。

7 参见 <https://portal.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kennzahlen/digitale-sammlungen>（访问日期 2016 年 9 月）。

联系方式

Dr. Cornelia Weber, Head of th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Scientific University Collections in Germany

Address: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Unter den Linden 6, 10099 Berlin, Germany

E-mail: weber@mathematik.hu-berlin.de

<http://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

Martin Stricker,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Scientific University Collections in Germany

Address: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Unter den Linden 6, 10099 Berlin, Germany

E-mail: stricker@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

<http://wissenschaftliche-sammlungen.de>

关键词

Scientific infrastructure, Key indicators, Strategies



大学博物馆反映的大图景： 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案例 分析

胡盈 / 文
陈力子 / 译

概要

大学博物馆本身就是大学的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它们应当走出校园围墙，反射出大学和大学社区的特性。然而，大学博物馆常困于资金预算和空间不足。本文讨论了几个案例，显示出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是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解决此问题，包括：将整个大学校园视作博物馆的活动场地，以及校园里的每个人视作“行走的博物馆代言人”。



引言

中国国内的大学博物馆历史可回溯到 20 世纪早期,但直到 21 世纪伊始才得到足够的重视。20 世纪早期的几所大学博物馆由海归和西方来华学者参与成立,“博物馆”的概念也在当时进入中国(Wang 2011)。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动乱后,中国的博物馆工业在 20 世纪晚期开始蓬勃发展。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在获得政府支持后飞速前进。

在各类型博物馆中,大学博物馆获得的关注最少。2011 年,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2011),被视为大学博物馆的国家政策指导。次年成立了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成员超过 70 所博物馆¹。随后,其他地区高校博物馆联盟也相继成立。这些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从基础设施向内容发展,从陈列到阐释和参与的兴趣转变。

中国大部分大学博物馆的运营都非常依赖大学的财政支持。虽然大学博物馆常常获赠珍贵的历史收藏,在与学校其他部门竞争运营支持和行政关注时它们仍然有一种“被忽略的继子”的感觉(Alvord 2012)。多数大学管理层不太可能重点关注博物馆,大部分大学博物馆还是得挣扎求存,因此,大学博物馆相互之间形成联盟、避免孤立就变得极为重要。并且,它们还需要反映出所在组织环境的更大图景。

与此同时,展品收藏和展览策划正在改变。菲欧娜·卡梅隆(Fiona Cameron)提出“液态博物馆”(liquid museum)的概念,博物馆将进行一系列改革,变得“液化、流动化和关联化”(Cameron 2015)。

在此理论背景下,本文探讨了大学博物馆系统采取的措施,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蓬勃发展,同时满足并反映大社区的需求。

管理体系

1951 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上海,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大特色是拥有为所有教育层次而设的师范专业。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由 5 部分组成:中国古代钱币和文物博物馆、生物博物馆、“海上风”民俗博物馆、地理学博物馆和教育影像博物馆。所有分馆的藏品都来自不同院系,在被纳入学校博物馆体系之前,所有藏品只在各自院系做教学和研究之用。

中国古代钱币和文物博物馆隶属于历史系,收藏了包括青铜、玉器和陶瓷等的古代中国文物。其中独特的钱币馆藏覆盖了 3 000 年的中国历史。生物博物馆位于生物科学学院,藏有大量植物、动物标本,最珍贵的是熊猫和金丝猴标本。“海上风”民俗博物馆隶属于社会学系,特色收藏是农民画和地方艺术家剪纸艺术品。地理学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科学标本。教育影像博物馆还在建设中,收藏品主要来自教育科学学院,该馆将会是第一个收藏、阐释 20 世纪中国教育史影像、音频记录的博物馆。

¹ 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 <http://museums.sjtu.edu.cn/Web/BWGLM/226001.htm>, 访问时间 2016 年 9 月 6 日。



图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钱币和
文物博物馆

图片由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提供



图 2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

图片由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提供

资源短缺是许多大学博物馆都存在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也面临着空间有限、预算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学校曾讨论建造新博物馆大楼的计划，将所有分馆集中起来，增加大学博物馆的影响力。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博物馆就能雇佣更多人手并获得更多展览空间。然而，该计划目前暂缓实行。集中建设博物馆并不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大学也担心该计划需要不断扩大的资金投入。

因此，博物馆设立了折中的管理体系。各个博物馆分立在各处，设立博物馆管理中心办公室，统一管理展览收藏并协助博物馆实现其功能。这一形式来源于辛普森（Simpson，2012）的行政集中模式。办公室负责制定战略计划和年度目标，筹集资金，在校内外寻求资源支持并协调内部展览项目。并且办公室聘用了博物馆管理专家为博物馆运营提供专业建议。博物馆管理中心办公室的直接汇报上级是大学副校长，因而办公室充当着博物馆和大学官方之间的桥梁。

除了向副校长汇报外，办公室也需定期向宣传部、发展规划办、基建处、档案馆和对外联络处这五个部门汇报，为校内博物馆管理寻求建议与支持。虽然这些部门与博物馆没有上下级行政关系，博物馆也十分乐意与他们一同寻求发展。这些部门也会协助博物馆克服行政难题，以及解决资金和空间方面的问题。



办公室也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协助博物馆的运作。委员会成员包括收藏品所在各个院系的教授,大学内若干后勤部门领导以及外部博物馆专家。委员们不仅为博物馆提供支持,也协助开展展览项目和实践工作。教授们代表了展览涉及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博物馆专家则包括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地区博物馆的主管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同行博物馆专家。通过设立该委员会,博物馆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外部资金资源得到了拓展,博物馆也获得了来自校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展览项目或临时的需要,成立不同的委员会。例如,当一所博物馆需要对展览进行评估时,便会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邀请博物馆以外的相关学科教授加入到项目之中。

委员会和委员们为博物馆带来了资金,并确保临时展览所需的足够空间。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帮助博物馆对如何将自身发展与大学发展相融合的问题进行思考,由此博物馆可从大学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咨询委员会是我国建立健全博物馆管理体系的一次尝试。2015年,中国发布《博物馆条例》,被视为是博物馆管理的第一部国家法例(2015)。该《条例》敦促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建设。理事会概念借自美国,目的在于鼓励公众参与并监督博物馆的运行。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是第一批邀请外部人员参与决策制定和日常事务的大学博物馆之一。

“消费者”和“创造者”

公众参与展览并非新鲜事(Ahmad et al. 2015),然而让公众参与到博物馆工作的全过程,从展品收集到展览宣传,并没有得到普及。这在社区博物馆内更为普遍,而大学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一类别。让大学社区成员参与博物馆的好处不仅在于有了更多的智识、人力资源,其本身也是提升博物馆形象的行为。人们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种归属感。

“人”是大学博物馆最大、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能积极与校园其他部门互动,除了制定决策的少数人员以外,整个“目标市场”(target market,即校园)都是博物馆的潜在资源(Kotler & Kotler 1998)。学生、教授、员工和校友不仅是博物馆的“消费者”(consumers),只要博物馆向他们开放,他们也会成为校园博物馆“景观”的“创造者”(producers)。除了尝试用不同项目联合少数人群,校园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是“行走的博物馆代言人”。那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创造有利于展览的“藏品”,阐释博物馆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博物馆进行宣传。

博物馆景观

“景观”(landscape)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博物馆领域时,指一种博物馆展示的新技术,该技术基于18世纪风景景观画的构图原则(Rich 2016)。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的景观,对外展现特色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然而,景观并非只是物理存在或是物质证据,也包括了继承并塑造的图像和符号。在一所大学中,景观标志着机构的身份。因此,大学博物馆能够代表一种展览之外的身份,也能作为展览背景语境的一种反映。



建筑背后的景观

华东师范大校园主干道的每个路灯上都安装着印有教授和学生话语的蓝色旗子，旗子内容都是关于大学精神和文化的。人们走在校园内，经过一个个的旗子，就像与教授和学生同行，一起谈论着对大学的理解和发生过的轶事。这些旗子加深了观众对大学的印象。诸如此类潜移默化的影响代表着大学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低成本的动作就能使博物馆达到想要的效果，反映大学的宏大背景。因此，通过收集、保管、阐释和展现校园景观，大学博物馆融合了大学的价值观。以下案例展示了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是如何贯彻这一理念的。

为响应 2016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与文化景观”（Museum and Cultural Landscape），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生物馆举办了名为“校园里的鸟儿：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Birds on Campus: Natural Landscape and Cultural Landscape）展览。博物馆发起摄影和绘画竞赛，主题内容即为校园中的鸟类。教师学生都积极响应，博物馆收集到了众多优秀作品，经挑选后展出。值得注意的是，竞赛和展览的组织都由学生自己完成。博物馆与学生社团“生命与自然社”携手合作，指导学生设计活动、组织展览。此外，题为“鸟类剪纸”的剪纸工作坊活动也与展览一同进行。博物馆邀请了本地剪纸大师教授学生们上海风格的剪纸，工作坊不仅是对展览的呼应，也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在“整个校园都是博物馆乐园”的理念下，展览的第二个阶段进入到教学楼、图书馆和学校餐厅之中。摄影和绘画作品经过框裱后挂到了教学楼中；有关生物博物馆展览历史和故事的视频短片在学校餐厅中播出；图书馆大厅的图书角也设定了“生命与自然”（life and nature）主题，人人都可以取书阅览。并且，学生们还设计出相关衍生产品，如海报、别针和书签等。由此，博物馆和展览得到了宣传，并且延伸到了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围墙之外的博物馆

另一个案例来自“海上风”民俗博物馆。为配合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民俗博物馆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剪纸景观”的活动。艺术家设计了一幅大型剪纸模板，其中包括校园里各种经典和历史建筑形象。博物馆还举办工作坊活动，邀请学生和老师各自剪出模板中的一小部分。师生们创造的小作品都被收集到一起，呈现出校园的自然景观艺术。在剪纸作品下，所有有贡献的师生都签下了作品完成的时刻，作品也被收录在博物馆的永久展览中。多人协作的剪纸作品不仅被视为一件艺术品，也是大家在特定时刻创作的景观作品。这就是学术博物馆的收藏原则，不仅收藏历史，也为了未来保留现在。现在会变成过去，也会在未来成为一个历史时刻。



图 3

剪纸工作坊

图片由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提供



民俗博物馆接下来的计划是利用剪纸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提升校园文化景观。博物馆设计的另一个“先贤·景观——师大文脉的民俗再现”(Masters' Image and Oral History)项目,将记录 100 位著名学者和重要校友陈述大学时光的故事,剪纸大师将剪出他们的形象。这些剪纸图像和录制的音频随后会被制作成展览。观众进入展览时会看到教授和校友的剪纸“身影”。通过扫描二维码,观众可以在智能设备上观看短视频,了解教授和校友们口中的大学历史和故事。这一展览的目的在于通过呈现校园内“活着的”(living)景观,重新唤醒人们对大学精神的思考。

展览中也会使用二维码增加用户的参与度。尤其对于大学生观众群体而言,二维码已被视为展览的一项良好辅助技术(Pérez-sanagustín et al. 2016; Demir et al. 2015)。此外,二维码不仅是信息消费的手段,也被用户视为社交空间(Shin et al. 2012)。在展品中使用二维码,呈现给观众熟悉的话题,能带来娱乐和社交的多重维度。因此,二维码能够引领博物馆突破物理空间,将展览传播到围墙之外的世界。

校园之外的景观

作为一座学术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不仅属于校园,也属于上海这座大都市。“海上风”民俗博物馆曾经举办论坛,邀请全国的手艺人前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游览了上海地标——外滩景区后,请所有手艺人以自己的工艺再现外滩,如剪纸、花生画、刺绣等。在此活动中,上海的景观以多种艺术方式呈现出来,上海对多样性的包容也以一种新的维度体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学术院系的支持,这个论坛无法举办。正是大学各院系的名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手艺人参加论坛。

另一个活动案例来自中国古代钱币和文物博物馆。博物馆与学生社团一同开展“少年热爱历史”(Youth Loving History)的高中生历史戏剧写作竞赛活动,主题为“丝绸之路与文明融合”(Silk Roa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最佳作品将由学生进行表演。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路线,最近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倡议重新成为热议话题。博物馆为学生举办关于丝绸之路的讲座,内容涉及丝路的历史和经济重要性,相关文物也配合该主题展出。博物馆受邀成为表演竞赛的评委,作为回报,该竞赛也成为宣传博物馆的一个途径,展现出博物馆具备的全球视野和学生关怀。该竞赛的意义还在于赋予丝绸之路文化景观概念以新的内涵,并协助阐释、反映出丝绸之路景观的图景和概念。

关于博物馆是否应当参与戏剧表演的问题引起了讨论,关注点在于这是否会损害已知历史的严肃性。然而,博物馆将美术与表演艺术相结合是一个趋势(Burcaw 1997)。达拉斯艺术博物馆(Dallas Museum of Art)的活动就是一个极好的实践案例(Pitman & Hirzy 2010),这也说明博物馆的公众参与并非必须发生在博物馆内部,也可以专门为特定人群的兴趣而设计。在中国,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博物馆与学校学生合作,跨出博物馆大门为青少年族群设计课外活动。这一趋势始于 2015 年颁布的关于促进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指导性文件(2015)。该文件为几乎所有博物馆带来了变革,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新模式由此形成。



未来：“创造”景观

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作为一个聚合资源的中心，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实践工作，不仅负责了自己的收藏，也维护了大学、城市和国家的景观。在此过程中，博物馆获得了大量的支持。然而，未来还需要做什么呢？下一步的行动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大学博物馆不能止步于作为反映或呈现已有事物的镜子，还应该成为大学中“创造”景观的场所。景观并不非得是物质呈现，也可以是有关于学术氛围、专业追求和校园文化，这些都是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虽然博物馆常被置于边缘地带，但还是可以整合这些要素，成为创新的推动力。根据现有的情况，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大学博物馆投入努力。

首先，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作为一所学术博物馆应当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投入更多努力。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可被应用到研究和阐释当中。学术博物馆能够成为推进跨学科合作、引领教育新方向的校园领导者。博物馆收藏能以多种方式进行研究和阐释，学术博物馆应当成为研究前沿的孵化器。这样，博物馆就可以在学术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便是一个例证。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发起了科学和艺术基金会，每年该基金会都会举办全球性的科学研讨会，以及与科学议题相关的艺术作品竞赛，挑选出的艺术作品构成了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展览。这一活动促进了对科学的思考，也提升了艺术表达的新形式。通过举办这样的年度展览和研讨会，博物馆引领了前沿学术讨论，并提升了自身在大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其次，学术博物馆所处的校园和社会包容多样性，博物馆可更为积极地促进文化交流。方式包括举办展览或工作坊，鼓励多文化背景的学生参与并为他们丰富的文化表达方式提供平台。例如，博物馆目前正在策划的活动项目名为“一件物品，一百个故事”（One Object, One-hundred Stories）。在这个项目中，博物馆将一次挑选一件物品，为国际学生举办讲座和工作坊，从艺术、文化或历史的角度阐释物品。这些讲座和工作坊实际是想激发出学生讲述自身故事的灵感。学生受到鼓励，从自身文化背景回应物品或故事。他们的回应可能是相似的物品不同的内涵，或不同的物品相似的用途，或任何他们想到的事物。所有的这些反馈不仅会作为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能成为一个小型展览，呈现出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于大学博物馆来说，这样的小型展览极具成本效益，对于社区和其他大型博物馆而言也有启示作用。

最后，作为一所位于“社区”中的博物馆，学生教育被视为最重要任务，博物馆应当多维度地朝着这个主要目标迈进。例如，耶鲁大学大英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曾为耶鲁医学院（Yale School of Medicine）提供一个“提升观察技术”（Enhancing Observational Skills, EOS）项目，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观察技术，协助这些未来的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更为细致、准确。这一项目用美术作为媒介和正式的训练工具，用以教授临床医学。该项目立意之新、效果之佳，让其他机构，如曼荷莲学院艺术博物馆（Mount Holyoke College Art Museum）等，也策划了类似项目（Alvord 2012）。这一项目在整合大学博物馆和不同院系学生课业学习方面提供了绝佳案例，也启发了探索更多以博物馆为中心的项目，积极地参与到专业学习当中。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而言，学生就是未来的老师，因此，博物馆能作为未来老师的理想实践平台，培养和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



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境况独特,但仍能为大学博物馆分享一些经验。上述小型活动项目案例对大型博物馆而言或许微不足道,但代表了博物馆现阶段对如何在大学内尽可能利用博物馆的思考。现今,学术博物馆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包括争取观众、获取名声和支持。因此需要用创新的方法迎接挑战,找寻发展。

要常常反问: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展开宏观视角?如何更好地融入社区,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如何在应对质疑校园博物馆存在必要性的时候,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要不断拓展视角,思考超越自我。一所学术博物馆不应只聚焦于本身的收藏,脱离于校园之外,而要试着加入、阐释甚至塑造大学校园和社区的文化景观。通过这些努力,博物馆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责任,并同时收获更多关注和支持。

本文也作为一份代表了目前中国博物馆发展趋势的案例报告。博物馆应当宽泛地、主动地满足社区和社会的需求。对于大学博物馆的发展而言,关注点已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内容发展,从独立于大学转向直接参与大学的发展。

致谢

衷心感谢华东师大校长助理、博物馆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程静老师,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大学的博物馆发展。我还要向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所有同事,包括教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所有的帮助,博物馆无法取得目前的成就。我还要感谢陈旭蔚,他与我分享了李政道图书馆(博物馆)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Alvord, E. 2012. Visual Literacy and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quiry: A Case Study for Institutio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Jandl, S. & M. Gold (eds) (Cambridge: MuseumsEtc), 144-165.
- Ahmad, S., Abbas, M.Y., Yusof, W.Z.M. & M.Z.M. Taib, 2015. Adapting Museum Visitor as Participants Benefits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68: 156-170.
- Burcaw, G.E. 1997.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56.
- Cameron, F. 2015. The Liquid Museum: New Institutional Ontologies for a Complex, Uncertain World.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2, MCCARTHY, C. (ED) (Chic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17: 345-361.
- Demir, S., Kaynak, R., & K.A. Demir, 2015. Usage Level and Future Intent of Use of Quick Response (QR) Codes for Mobile Marke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urke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81: 405-413.
- Jandl, S. & M. Gold (eds) 2012. *Introduction to: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MuseumsEtc). 12-17.
- Kotler, N. & P. Kotler, 1998. *Museum Strategy and Marketing: Designing Missions, Building Audiences, Generating Revenue and Resourc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Regulations on Museums.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3/02/content_2823823.htm (accessed August, 15, 2016).
- Pérez-Sanagustín, M., Parra, D., Verdugo, R., García-Galleguillos, G., & M. Nussbaum, 2016. Using QR Codes to Increase User Engagement in Museum-like Spac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0: 73-85.
- Rich, J. 2016. Sound, Mobility and Landscapes of Exhibition: Radio-guided Tours at the Science Museum, London, 1960-1964.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52: 61-73.



Simpson, 2012. Model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Beyond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S. Jandl, & M. Gold (eds): 178-218.

Shin, D.H., Jung, J., & B.H. Chang, 2012. The Psychology behind QR Codes: User Experience Perspectiv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4):1417-1426.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Alliance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Museums, <http://museums.sjtu.edu.cn/Web/BWGLM/226001.htm> (accessed August 8, 2016).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2011. Announcement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Museums.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9/201106/120370.html (accessed October 16, 2015).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2015. Guidelines about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Museums and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Museum Education Activities. 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1509/t20150915_208161.html (accessed August 14, 2016).

Tsung Dao Lee Archives Online, <http://www.tdleelib.info/>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6).

Wang Hongjun, 2001. The Basics of Chinese Museology.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Press.

联系方式

Ying Hu, Curator of Museum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ddr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663 North Zhongshan Road, 200062, Shanghai, China

E-mail: huying@mail.ecnu.edu.cn

关键词

University museum,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大学博物馆在新文化景观形成中的角色：伊斯坦布尔金角湾案例

Nurten Ozdemir, Hikmet Sivri Gokmen / 文
陈力子 / 译

摘要

博物馆在保护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 及其与城市融合、公众展示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此，本文聚焦于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金角湾 (Golden Horn) 历史工业区中的大学博物馆，该地区在建成大学和博物馆后转变成了文化和教育区域。西拉塔拉发电厂 (Silahtarağa Power Plant) 和希巴里卷烟厂 (Cibali Tobacco Factories) 经过整修后成为比尔基大学 (Bilgi University) 和卡蒂尔·哈斯大学 (Kadir Has University)，这两个不同的案例显示了大学博物馆在金角湾地区创造新文化景观和影响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文化机构，大学博物馆通过提供教育景观，发挥了整合当地社区和新文化景观的重要作用。



“文化景观”是 20 世纪最新出现的术语之一。由于是跨学科研究，其定义有多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是“人类社会与聚落随着时间发展，在物理环境约束和自然环境机遇，以及在连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根据安特洛普（Antrop）的论述（2005），文化景观是空间结构和地区这两者重组过程的结果，以满足社区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该术语可被概括为人类和文化对自然的干预及三者的和谐共存（Özsule 2005）。

既然文化景观与自然、社会和文化要素产生了关联，其发展就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一致。例如，位于农村地区的工业景观在被扩张的城市覆盖后拥有了新的功能，创造出新的景观。本文将着眼于对新环境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工业景观。

工业地区有三种类型的景观，即工业厂房设立前、设立后和后工业景观。虽然宽广开阔的土地保留了工业革命前的自然景观，但工厂的设立改变了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些遗址转变成了城市的游览中心。新的建筑环境、社交机遇和网络交流创造出了一幅新的景观。然而，工业遗址虽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却面临着可能变成废弃区域的威胁。

于是，出现了工业文化景观保护方式的相关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经确定了保护这些区域的若干原则：地方社区应当表明态度；权益相关方之间应当互相沟通；管理模式应得到执行（Unesco 2009, 35-36）。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States）声明：遗址的文化和历史重要性应当以不同方式向社区宣告和阐明，对遗址的使用应当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Madran & Özgönül 2005, 37）。社会意识对遗址的需求尤其重要。在此，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博物馆，能向社区展现文化景观、建立社会意识、整合文化景观和城市生活记忆，并为工业地区提供新文化景观。

随着现代博物馆学的发展，以物为基础的展陈方式已改变。现在的博物馆学还包括了将人们的生活空间及其活动转化成博物馆一部分的过程。不仅是物品，任何人类—自然—文化三方互动产生的无形或有形的形式，也成为了博物馆记录的对象（Kandemir 2013, 137）。符号、技术和物品都是社会习俗和价值的有形证据，但无形遗产应当被视为有形遗产成形和获得意义的背景（Bouchenaki 2003）。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包括了有形和无形遗产。虽然景观本身是有形的物质结构，但景观内部的过程和行为组成了文化景观的无形特点。这就是为何文化景观和博物馆组织具有潜力，使得无形和有形价值的呈现媒介更多样化，并增进社区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除了博物馆外，大学所具备的教育和文化设施也能通过教育活动提升公众的文化景观意识。尤其是，位于历史地区的大学博物馆能通过历史建筑内创造空间体验，来提升学生和当地社区的景观意识。大学博物馆作为大学景观的一部分，在丰富交流媒介的同时也融合了不同社会群体，整合了非正式学习和学术研究，并连接了科学和社会。如果这些拥有大学、博物馆及教育景观的地区建立在历史景观之中，它们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景观，推动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本文聚焦于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地区及其工业文化景观，反思了大学博物馆对该地区的改造、该地区的新文化景观、大学收藏品与项目中的景观要素。金角湾是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进入欧洲大陆而形成的海湾，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势成为避风港，在工业地区的建立和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金角湾因其地理环境而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在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Ottoman period），穆斯林（Muslim）、希腊（Greek）和亚美尼亚社群（Armenian settlements）共同塑造了金角湾沿岸景观，树木、水池、喷泉和玫瑰园等使得该地区在工业化时期前都被描述为一处娱乐休闲地。工业革命成为该地区景观的转折点。18 世纪以后，金角湾转变为工业景观地区，该地区遍布工厂、小型作坊、商店和其他场所。到了 19 世纪，曾经分布在沿岸的宫殿和房屋被造船厂、面粉厂和造船厂取而代之（Koksall 1996）（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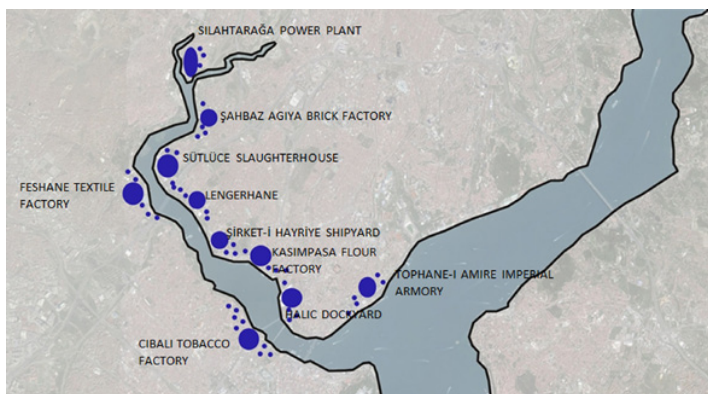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初金角湾的工业景观
(N. Ozdemir 的私人收藏, 2016)

金角湾的工业化时期由法国城市规划家亨利·普罗斯特（Henry Prost）在 1936 年提出的普罗斯特计划（Prost Plan）所引导。该计划旨在保护城市的整体轮廓。普罗斯特建议在城市的纪念性建筑周围建设开放区域，设计新的道路，朝向纪念建筑形成透视轴，就像奥斯曼设计的巴黎（Haussmann's Paris）一样（Bilsel 2011, 112）。金角湾的历史核心建筑物被彻底改造，居民区和商业区被移除，沿岸地带被工业建筑占据。1950 年后，地区贸易的集中和人口增长使得沿岸地带后方的贫民窟不断增加。

20 世纪 80 年代是金角湾成为文化遗产产业的另一个转折点。从 1986 年金角湾海滨复兴工程开始，若干项干预措施已经介入来清理这片重要区域，使其具有全球城市形象。这些措施包括填海、海岸美化工程、清理工业等（Gunay 2014, 102）。21 世纪伊始，古内伊（Gunay）研究指出：“金角湾文化谷项目在地区的工业遗产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该项目内容多样，包括保护历史海滨社区，改造并重新定义历史工业设施功能，以及利用文化设施和景观设计等。”（GUNAY 2014, 102）2000 年以后，这一进程在私立大学的成立和文化资源支持下持续进行。比如，这些私立大学包括比尔基大学和卡蒂尔·哈斯大学。大学以其多样化的设施和社区群体加速了金角湾的转变。



金角湾是一个带有天然港口特点的城市，曾经作为贸易港口和工业区，最终被重新定义为文化谷（Erden 2009, 10）。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工业建筑被重新规划为文化中心、博物馆或大学（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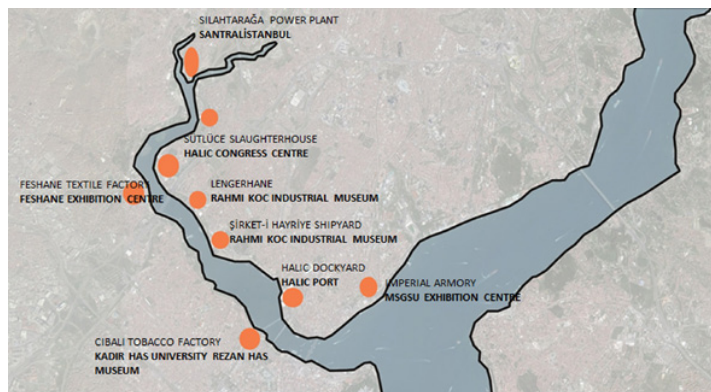


图 2

金角湾重新运作的工业建筑
(N. Ozdemir 的私人收藏, 2016)

托芬艾·米雷（Tophane-i Amire）自 15 世纪开始就被用作造炮厂，1993 年改造成为米马尔西南美术大学（Mimar Sinan Fine Arts University），作为展览、文化和艺术中心。土耳其第一座纺织厂建立于 19 世纪，为奥斯曼帝国军队（Ottoman army）生产毡帽。1998 年费士恩纺织厂（Feshane Textile Factory）经改造，成为展览、博览会和音乐会之用。苏特琉斯屠宰场（Sütlüce Slaughterhouse）原建于 1923 年，是肉类切割和分配的工厂，2006 年被改造成海利国会中心（Haliç Congress Centre），为国会、会议、博览会、展览和电影首映式提供场地。建于 19 世纪的冷格尔哈内（Lengerhane）和斯克哈利耶（Şirket-i Hayriye）造船厂经过 1994 年和 2001 年 2 次翻新后成为拉赫米·克契（Rahmi Koç）工业博物馆（Koksall 2007）。古内伊指出：“金角湾的造船厂是现存仍在运营的最古老的造船厂，最近也将关闭，改造为娱乐和旅游码头。”（Gunay 2014, 103）

除了这些文化机构以外，主要的改造项目由 2000 年后成立的卡蒂尔·哈斯大学和比尔基大学实现。两所大学构成了金角湾的教育景观，隶属于文化谷的一部分。大学宗旨在于成为服务于学生和当地社区的教育机构。在此过程中，大学博物馆在为金角湾带来新的文化和教育景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案例研究显示，西拉塔拉发电厂和希巴里卷烟厂的物理构造和景观各不相同，但都因其在南北海岸引发的改造使得人们注意到金角湾的工业景观。由此，本文将评估比尔基大学的能源博物馆（Energy Museum）和卡蒂尔·哈斯大学的瑞桑·哈斯博物馆（Rezan Has Museum）在金角湾地区的改革作用及其对文化景观的影响。

从希巴里卷烟厂到卡蒂尔·哈斯大学

在金角湾改造进程中，希巴里卷烟厂被改造成卡蒂尔·哈斯大学，由卡蒂尔·哈斯基金会（Kadir Has Foundation）建成。希巴里卷烟厂成立于 1884 年，自 1900 年开始生产卷烟。工厂由法国政府掌管至 1925 年后移交土耳其政府。庞大的厂房为烟草加工和卷烟生产提供空间，1946 年制造出第一支本土雪茄，1959 年制造出第一支滤嘴香烟。厂房设施包括若干座建筑，由通道和庭院连接。希巴里卷烟厂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和建设技术。空间大小和不同于古典时期建筑艺术的新古典建筑风格，都是时代的有趣例证（Alper 2008）。



根据工厂网站的陈述：希巴里卷烟厂实际上是一座小镇，拥有当地的警察和政府机关、医院、日托中心、杂货店、学校、消防局、运动场、工会和餐馆。工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改变了社区。直到 1995 年工厂仍在运行，随后因设备老旧而关闭。卡蒂尔·哈斯基基金会买下了厂房并在 1998—2002 年间将其改造成为卡蒂尔·哈斯大学。大学在 2002 年开始正式提供教育服务。大学项目设计的初衷就具有公共利益性，并且通过保护金角湾的遗址为文化和历史的可持续性做出贡献（Alper 2008）。此外，希巴里卷烟厂的中心位置和交通设施都是改造后的有利条件（Budan 2008, 73）。埃尔登（Erden）指出：“该项目独特之处在于将旧工业建筑改造成大学的第一个案例，不同于其他情况，这为环境带来了显著的新影响。”（ERDEN 2009, 8-9）

卡蒂尔·哈斯大学瑞桑·哈斯博物馆

在希巴里卷烟厂改造过程中，位于该建筑地下室的拜占庭蓄水池（Byzantine Cistern）和土耳其浴场（Turkish Bath）的遗迹，曾被用作烟草仓库已被改造成了历史博物馆。高质量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展出不断，使观众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博物馆的大量藏品的展期也不断延长。展览包括绘画、陶瓷、珠宝和摄影展等。除了藏品以外，历史遗迹也是博物馆的主焦点，许多观众前来体验其中充满挑战的氛围（图 3）。戏剧系的学生也在此准备表演。然而，博物馆并没有呈现任何与卷烟厂时期相关的展品。虽然曾作为工业建筑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却难以了解其之前的功能。



图 3

历史遗迹构成瑞桑·哈斯博物馆的主要景点
(N.Ozdemir 的私人收藏, 2016)

可以说大学和博物馆合作准备展览活动是不够的。只有少数几个与展览主题相关的讨论会和座谈会得以组织，并对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博物馆难以接触广大社区的原因。博物馆坐落在城市中可被改造的区域，其肩负着融合大学与公众的重要使命，但需要与大学进行互动。

不仅是博物馆本身，教学楼之间的庭院也被用作展览区。教学单元和艺术展厅都在大学建筑内（图 4）。例如，在其中一个庭院内，希巴里卷烟厂的摄影展正在展出，另一个庭院里则展示着克契家族（Koç family）的私人物品和图片。因此，观众有机会在展览中体会整座大学的建筑。此外，学生们也有机会在求学中体验这种艺术氛围。



图 4
教学建筑之间的庭院被用作艺术
展厅
(N. Ozdemir 的私人收藏, 2016)

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

另一个案例是成立于 1996 年的比尔基大学。该大学关注社会敏感度、环境与自然的互动，将校区设在了城市的贫困地区以便为当地居民提供多样的教育机会。西拉塔拉发电厂是该大学的第三校区，自 1980 年以来该地区就是一片贫民窟环绕的棕色地带（旧房清除后可盖新房的地区，Okandan 2016，43）。

阿克索伊（Aksoy）等学者指出：“西拉塔拉发电厂即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第一座城市规模的发电厂，也是第一座使用煤炭能源的火电厂。”（Aksoy, Acikbas & Akman 2009，11）从 1910—1950 年的 40 余年间，西拉塔拉发电厂不断发展壮大，为伊斯坦布尔提供电力资源。之所以选择西拉塔拉地区建设发电厂，原因是此处是一个避风港，便于海路运输，周围土壤肥沃。发电厂是伊斯坦布尔现代工业设备的第一批案例之一，厂房区还设有诸如咖啡厅、酒吧、居民区、礼堂、俱乐部、公共浴室和一个小型足球场等公共设施（Aksoy, Acikbas & Akman 2009，21）。

1983 年发电厂完成了使命后被作为工业遗产保护起来。2002 年，伊斯坦布尔市政府采纳意见，赋予该地区新的文化功能。2004 年，比尔基大学承担起保护发电厂的使命，将其作为教育文化地区和博物馆的任务。2007 年保护工作完成后，发电厂的五座主楼被改建成一个现代艺术展览空间、一座能源博物馆和一个公共图书馆。工人居住区经过翻新成为精品酒店和工作区。根据初始计划，生产区被改建成教学单元和博物馆，居民区改建成公共区域。现存建筑被保留下来没有改动，只做了基本的处理。比尔基大学的新校区被称为“伊斯坦布尔中心”，“中心”一词反映出发电厂的名字。西拉塔拉发电厂改造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可生产的资源，即信息、文化、教育和艺术等 21 世纪的流行元素，以期起到一种类似于电在 20 世纪初发挥的变革作用一样（Aksoy, Acikbas & Akman 2009，11）。

大学想要通过联系当地社区来创造一种社会文化变革。比尔基大学接管工业遗址时，也接管了此地的历史和记忆。因此，要讨论的不仅是物理空间，还有地方精神。伊斯坦布尔中心旨在满足社会各阶层对文化和教育的需求，通过文化项目、资讯、文献和档案资源，以及面向科学和艺术的游览和教育项目，利用博物馆让公众使用并参与（Aksoy, Acikbas & Akman 2009，53）。博物馆肩负着校区最重要的任务，即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并保存地方记忆。



伊斯坦布尔中心能源博物馆

伊斯坦布尔文化中心的焦点是由一个被毁的锅炉房重建而成的现代艺术博物馆（Contemporary Art Museum）和一个动力车间改建而成的能源博物馆。能源博物馆位于西拉塔拉发电厂电力生产单元内，其中曾是涡轮机和控制室所在地。涡轮发电机反映了当时的先进技术，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博物馆致力于向观众展示 20 世纪早期电力生产的概况。阿卡索伊（Aksoy）等学者指出：“近距离观察保存良好、没有变形的涡轮发电机和控制室，能为人们提供大量有关发电厂技术体系和生产过程运行逻辑的信息”（Aksoy, Acikbas & Akman 2009, 52）（图 5）。



图 5
能源博物馆的涡轮发动机组
（N.Ozdemir 的私人收藏，2016）

除了机器展品外，建筑本身也是展览的对象。因此，建筑周围环绕了一圈桥梁让观众环形，确保人们能够体会工业设计的美感和建筑的体量。虽然博物馆内部是展示机器和开展各种活动的空间，但整个工业景观也可视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能源博物馆利用了现代技术，在“能源游戏区”（energy play area）使用多媒体展示技术，以互动方式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图 6）。观众可以尝试着发电，堆砌磁性雕塑，触摸成千上万的伏。博物馆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项目，通过为青少年儿童设计实验提供一个寓教于乐的学习环境。除了与能源主题相关的教育项目以外，博物馆人员还提供了有关西拉塔拉发电厂的历史资讯。博物馆也为因缺钱无法接受教育的成人设计了一些教育项目，举办研讨会，利用电影院或会议室组织讨论会。博物馆充当了校园内“转换器”的角色，在公众和学校教育项目的协助下与环境互动。



图 6
“能源游戏区”的互动活动
（N.Ozdemir 的私人收藏，2016）



大学博物馆的讨论与对比

在研究这些大学博物馆融合社区与文化景观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到博物馆三方面的表现:大学和当地社区的融合、文化价值意识的提升,以及地方精神的保护。

一个城镇的改造暗含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新旧的融合。希巴里卷烟厂和西拉塔拉发电厂改建成为大学的过程引发了一些适应性的问题,使得当地社区和大学之间的关系紧张。古内伊指出:“大部分观众都是外来人员,而社区本身对周围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有限。”(Gunay 2014, 105) 比尔基大学学生(Environs 2015)对当地社区居民的采访显示,居民们认为大学为社区注入了新鲜活力,但花园围墙和铁栏封闭了校园,他们觉得校园的大门是对外部居民的隔离。能源博物馆为成人和儿童组织的教育活动是为了融合社区与大学。在这些建设性努力下,一部分社区接受了新的教育和文化氛围并开始融入大学的景观之中。

然而,瑞桑·哈斯博物馆一般会为当地居民组织学术活动而非教育活动,这就是为何当地居民难以融入大学的教育环境。有篇论文评估了卡蒂尔·哈斯大学为环境带来的影响:大部分人即使收到了通知也没有参与活动(Çetin 2005);另一方面,他们则希望大学可以开放更多公共空间,为社区组织培训,促进该地区发展并与社区更好地融合。作为大学的对外窗口,瑞桑·哈斯博物馆有潜力满足当地社区的这些需求。博物馆可以为社区组织教育和文化活动,增进互动。

瑞桑·哈斯博物馆与能源博物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和博物馆之间的融合。虽然博物馆建在大学内,但仍作为独立博物馆运营。大学和博物馆互动的缺失会对大学和社区之间的交流带来消极的影响。博物馆需要组织活动增进大学和社区之间的互动,这对消除大学和公众之间的鸿沟起着重要作用。

教育活动可以作为提升当地社区和其他市民文化景观价值意识的工具。和其他博物馆不同,大学博物馆能够通过整合多学科研究来丰富教育媒介。然而,能源博物馆和瑞桑·哈斯博物馆似乎没有充分利用其优势来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由于部分当地社区声明并不了解工业景观的历史,而另一部分了解建筑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社区则认为社区应当接受培训,发现地区的重要性(Environs 2015; Cetin 2005)。在建筑历史价值还未知的情况下,博物馆应当组织活动,提供有关建筑历史的知识。



除了文化景观价值,后工业景观同样也具有纪念价值。工业遗址以前的使用者认可对工厂的改造,认为工厂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但博物馆需要策划更有效的展览,反映出这些遗址早前的功能。古内伊表示:“正如国际遗址与遗迹委员会(ICOMOS,2008)所提及的那样,解决方法是通过保存‘地方记忆’来保护‘工业景观’。尊重工业遗产历史特征的改造和再利用是一种合适并合算的方式;另一方面,利用原有形式并通过联系历史产生新的用途能够促进金角湾工业遗产的可持续性。”(Gunay 2014,106)能源博物馆通过工业机器展示了建筑先前的功能,而瑞桑·哈斯博物馆并没有展出任何卷烟厂相关的物品。博物馆大多反映了拜占庭风格。传达工业建筑独特环境的信息很重要,如博物馆中的声音、噪声和气味等。显然,工业进程只能通过机器为人所知(Koksal 2012,21)。两座博物馆未能做到的另一点是没有工厂社会文化生活相关的物品和文件。这就是为何观众没能了解到地方的记忆及其对城市的价值。文化机构创造的景观会影响整个金角湾的景观,并形成文化盆地。但是,占地广阔、形制统一的工业厂房之间也存在差异,每一个工厂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环境。例如,伊斯坦布尔中心的校园面积广阔,这让博物馆工作坊和学生活动得以在校园内进行而不会干扰周边环境。反之,卡蒂尔·哈斯大学只有一幢建筑,因此学生和观众需要其他场所活动。这就是为何大学周边环境被改造成休闲区域、咖啡厅、餐厅和类似的公共空间。当地社区表明,卡蒂尔·哈斯大学成立后,有工人进驻区域,也开放了新的公共空间。

虽然伊斯坦布尔中心是广阔的校园,包括金角湾溪、动植物种群和有利地势等,这些在工厂社交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改造过程中建筑师更着重于建筑和周边开阔区域的修复。尽管如此,建筑、交通线路、博物馆和溪流之间对景观有着重要作用的关系却遭到忽视。居民在采访中也表示,地区需要注入公园、演唱会场馆和野餐地等公共空间。此外,只要这些地区组织得当,与博物馆相融合,它们也能够展示出工厂的社会生活。

结论

在这段历史中,金角湾形成了多样的文化,有着多种历史和文化景观。然而,由于城市缺乏良好的规划发展,金角湾已经失去了特点。随后,将工业景观重新规划成文化和教育中心的措施开始在不同方面改变金角湾的环境。金角湾的特点通过文化机构变成了一个“文化盆地”,但主要的转变发生在大学及其博物馆成立之后。虽然国会中心、展览馆和博物馆可以在特定的时间使用,但大学博物馆更能长期为人们提供服务。大学组织的不同活动,观众长时间的参与,都为地区的转变进程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改造项目在邻近地区也带来了一些变化。在工业时期,工厂周边都是工人住房和配套设施,但当地区功能发生改变时,咖啡厅、学生宿舍和休闲区域等形成了学生和观众的新的景观需求。但最重要的是,大学要与社区相融合。在此过程中,大学博物馆肩负着大学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工作,有着重要的使命。博物馆通过为地区带来新的教育活动等并缓解大学与社区间紧张关系来促进地区改造的进程。



瑞桑·哈斯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中心能源博物馆之间的对比结果说明了为当地居民设计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围墙和宣传不足的消极影响。大学博物馆可通过制定一些计划,强化自身在地区中的角色并改善公众和大学间的关系,以促进文化景观的转变,例如:

- (1) 根据不同的宣传目的,博物馆项目可以有不同的设计,以适应地区的新环境;
- (2) 为儿童、学生和居民开设的活动不仅可以在博物馆建筑内进行,也可以在开阔地区进行,建立起文化景观意识;
- (3) 展览空间可以拓展到整个地区景观中,自然景观也能为展览带来效用价值;
- (4) 组织远足活动,通过路线设计来发现其他工业遗产地区;
- (5) 大学教师可在课程中积极利用工业景观、物品,提升对工业遗产的认识。

如果工业文化景观得到博物馆和大学的支持,它们就能避免荒废,并能创造出新的教育文化景观。但这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讨论。在改造过程中,当地社区的需求,社区和大学博物馆的关系,都是应当考虑并细致计划的。不仅是建筑,包括整个景观都应当涵括在博物馆概念当中。工业景观、地势利用、交通系统和休闲区域的社会学和技术改造线路都应当具有公共性并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否则,只向社区展现遗产的少数方面,人们就会忽略地区景观的其他面貌。

参考文献

- Aksoy, A., Acikbas, F. & Akman, A. 2009. The Silahtarağa power plant 1910—2004. İstanbul: İstanbul Bilgi Universty.
- Antrop, M. 2005. Why landscapes of the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0(1): 21–34. Elsevier B.V.
- Bilsel, C. 2011. “Les transformations d’İstanbul”: Henri Prost’s planning of İstanbul (1936-1951). *ITU*. Vol.8 no.1 pp.100-116.
- Bouchenaki, M. 2003. The interdependency of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OMOS 14th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Symposium.
- Budan, N. 2008. *Kültür endüstrisi çerçevesinde Santralistanbul örneği*. Master thesis, MSGSU.
- Cultural Landscapes. <http://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1>. (accessed May 10, 2016).
- Çetin, B. 2005. *İstanbul kent merkezi yakın çevresindeki konut alanlarındaki üniversite kampüslerinin sosyal ve fiziksel çevrenin canlandırılmasındaki etkileri*. Master thesis,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 Environs, 2015. Bilgi üniversitesi mimarlık öğrencilerinden Santralistanbul’un dönüşümü. <http://kot0.com/bilgi-universitesi-mimarlik-ogrencilerinden-santralistanbulun-donusumu/> (accessed October 26, 2016).
- Okandan D. G., 2016. İşletmecilik Tarihinde Modern’den Postmodern’e Bir Yolculuk: Silahtarağa Elektrik Santrali’nden Santralistanbul’a Sureklilik ve Değişim. *İstanbul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45, pp. 40-48.
- Energy Museum. <http://www.santralistanbul.org/pages/index/enerji-muzesi/en/> (accessed May 20, 2016).
- Erden, D. 2009. *Haliç’te dönüşüm ve tarihsel süreklilik*. Osmanlı Bankası Arşiv ve Araştırma Merkezi.
- Gunay, Z. 2014. The Golden Horn: Heritage industry vs. industrial heritage. *Uludağ Üniversitesi Mühendislik Fakültesi Dergisi* 19(2).
- History, <http://www.rhm.org.tr/en/history/> (accessed May 20, 2016).
- History and Terminology. <http://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1>. (accessed May 18, 2016).
- Kandemir, O. 2013. *Kültürel miras kapsamındaki yapıların çağdaş yaklaşımlarla müze işlevine adaptasyonu: ‘yeni’ mekansal deneyimler*. Anadolu University.
- Koksal, G. 1996. *Haliç tersanelerinin tarihsel teknolojik gelişim süreci ve koruma önerileri*. Master thesis.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Koksal, G. 2007. İstanbul'daki sanayi mirasının geleceği için bir öneri; "İstanbul Endüstri Mirası Rotası". kentvedemiryolu.com/indir.php?dosya=gul_koksal_istanbul_kent_smp.pdf (accessed May 20, 2016)

Koksal, G. 2012. Endüstri mirasını koruma ve yeniden kullanım yaklaşımı. *Guney Mimarlık*. 8, pp.18-23.

Madran, E. & Özgonul, N. 2005. Kültürel ve doğal değerlerin korunması. Ankara: TMMOB Mimarlar Odası.

Mehmet Alper ile Cibali Tutun ve Sigara Fabrikası'ndan Kadir Has Üniversitesi'ne. 2008. http://www.mimarizm.com/makale/mehmet-alper-ile-cibali-tutun-ve-sigara-fabrikasi-ndan-kadir-hasuniversitesi-ne_113537 (accessed May 22, 2016).

Özsule, Z. 2005. Geleneksel yerleşimlerin korunmasının kültürel peyzaj açısından değerlendirilmesi. PhD thesis, İstanbul University.

Tobacco Factory. <http://www.rhm.org.tr/en/tobacco-factory/> (accessed May 18, 2016).

Unesco. 2009.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a handbook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World heritage papers 26.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联系方式

Nurten Özdemir, Res. Asst., Dokuz Eylül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Address: Dokuz Eylül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İzmir, 35390, Turkey
E-mail: nurtenozdemir0@gmail.com

Hikmet Sivri Gökmen, Assoc. Prof. Dr., Dokuz Eylül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Address: Dokuz Eylül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İzmir, 35390, Turkey
E-mail: hikmetgokmen@gmail.com

关键词

Cultural landscape, Industrial heritage, University museums



科技博物馆在佩特雷大学 文化景观发展中的角色

Penelope Theologi-Gouti, Evangelos Vitoratos / 文
陈力子 / 译

摘要

本文是关于希腊佩特雷大学 (Patras University) 科技博物馆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TM) 的案例研究, 突显了该馆在大学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 发展和扩张中的角色。科技博物馆通过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非正式教育 (non-formal education) 服务, 为大学文化景观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获得大学和社会的一致肯定。该馆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改革并建立起高成本效益的运营准则。该馆还设计出传播科学文化的新方法, 改变了人们以往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惯例, 建立起强有力的大学—社区纽带。



引言

文化景观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对土地进行连续性重塑的结果。文化景观是变化的，其变化是以下三大驱动力同时作用的结果：可用性、城市化和全球化（Antrop 2003）。

科技博物馆由佩特雷大学建立于 2001 创建，作为自然科学学院实验室（Laboratory of the 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s）。博物馆既是研究所，也是休闲活动地。博物馆连接了大学和该地区中有形及无形的科学遗产，连接了科学和技术。作为大学博物馆，它成功地大批观众提供了服务，即便获得资助的机会远少于其他博物馆（Kelly 2001b）。

为了服务社区和实现目标，博物馆采取了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等专业协会惯用的举措，创造价值、提升兴趣、促进保护、提供规划和管理工具，并进行实际干预等成为了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工具（Rinaldi 2009）。希腊的大学博物馆还没有国家政策框架的支持，因此博物馆必须自寻出路，吸引更多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参与和知识管理，以助力于大学文化景观的发展。

自 2009 年向公众开放以来，科技博物馆已经设计了不同的对话和媒介方式与大学社区及社会交流，包括常设和临时展览¹。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通过许多其他方式与社会进行交流，如互动展览、教育展览（图 1）、主题宣传、专题研讨会、经验分享会、非正式的娱乐活动、表演艺术活动和音乐会等形式走进社区。各项活动都有志愿者和实习生参与支援（Theologi-Gouti 2014）。



图 1

教育活动“学习电话是怎样操作的”
照片由博物馆志愿者拍摄
佩特雷大学科技馆版权所有

科技博物馆的展览在一个友好的、以展品为基础的环境中，为不同观众提供了非正式教育服务。常设和临时展览都包括博物馆藏品、互动展品、演示实验、发明者和发明说明、跨学科和经验分享、历史源流和科学技术联系等。“生活中的通讯”（Telecommunications in our lives）²是博物馆常设展览的主题，有着动态的特点。常设展览经常会增加新的展品、资讯和大学学生设计的教育互动展品³（Theologi-Gouti 2014）。

1 参与组织临时展览的还包括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重要部门，如法语学院、佩特雷艺术家协会、中学教育自然科学中心等。他们共同应对环境、能源、艺术和科技、光线与颜色、摄影等问题。

2 常设展览的主题内容包括电子通讯的历史、通讯基础物理实验，以及不同通讯类型的记录，包括电报、电话、移动电话、广播、电视和声音等。

3 来自计算机工程和信息学系以及建筑系。在博物馆实习期间，他们为电子通讯历史、古希腊通讯、电话工作原理、电报、互联网、广播和电视等展览内容设计出互动展品。



本文着眼于科技博物馆在佩特雷大学文化景观人文维度的发展和大学之外文化景观中的延伸作用。景观作为自然和文化要素动态作用的呈现，在土地使用愈发密集的广泛环境下不断变化。作为大学博物馆，科技博物馆利用了大学的力量有效地传播知识、促进理解、保护遗产、宣扬高等教育，并改善大学校内外的生活质量（Kelly 2001b）。

影响

博物馆是大学与当地社区沟通的桥梁，通过融入社区和外部社会，博物馆活动能够促进技术发展和社会互动（Kelly 2006）。科技博物馆的定位即是佩特雷大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这一定位下，博物馆能通过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高质量的非正式教育服务，影响并改变佩特雷大学的文化景观。为观众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一方面来自博物馆运营经验以及博物馆日益重要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来自博物馆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压力。博物馆员工必须尽力了解观众，探索如何扩大观众群体，设计受欢迎的展览活动以增加人气（Hein 1998）。

当地社区大部分是教育社区，已经开始了解并评估科技博物馆在互惠互利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对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更大的社区也了解到博物馆的角色，并充分认识到博物馆在提供有关科学和技术知识方面的作用（Kelly 2006）。

博物馆已成功将三个层次的教育连接起来。这些连接已开始为大学带来许多好处，例如吸引高中生报考佩特雷大学来继续深造。博物馆也是一个连系不同群体的平台：大学和中学学生，学校教师，大学教职员工，特殊需要群体和其他不同人群等（Simon 2010）。这些群体都充当着内容创造者、传播者、消费者、评论家和合作者的角色。例如，大学员工和学生会与学校孩子玩乐，或为孩子设计活动或实验，孩子和老师又会参加博物馆特别组织的活动以获取不同层次的知识，孩子和老师也会与博物馆共同举办活动等。

博物馆为学校组织的教育活动包括寻宝游戏、表演艺术活动、猜谜、计算机互动活动、展示互动实验和教育游戏等。博物馆还设计了创新和有效的方法来传播科学技术文化。同时，博物馆还在培训学校学生如何使用博物馆。除了通讯、电报、电话、移动设备、信息、声音、计算机、网络安全等常规活动项目以外，博物馆还为 4~7 岁儿童设计出一个特别的教育项目，名为“发现‘博物馆孩子’的房子”（Discovering the House of “Museum Kid”）⁴。项目基于博物馆的特性，包括有不同的活动内容。

⁴ “博物馆孩子”是博物馆的吉祥物，为学校群体解释博物馆工作的一只小狗。



另一方面,博物馆通过实验和互动装置技术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科学与技术,这样的方式不只是提供讲解的声音,而是为每个人创造更宝贵、更有趣的体验(Simon 2010)。正因如此,科技博物馆得以成功地利用活动来吸引并教育观众,例如讲座、演唱会和其他为特殊观众组织的体验活动(图2)。这些活动使人们更容易领会科学和技术知识。一些活动是参与式项目⁵,让博物馆员工、观众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沟通更为顺畅。它们之间形成了新的途径让更多不同的人群表达自己,参与博物馆活动(Simon 2010)。由此,博物馆提升了大学生、中学生、学校教师和其他观众的科学素养。



图 2

观众活动“我来保护森林”
照片由博物馆志愿者拍摄
佩特雷大学科技馆版权所有

科技博物馆每年都在努力拓展人际互动网络(human participatory network)。这些网络为博物馆和观众创造出重要价值,也为馆外观众带来关注点,并在科学界和社会之间提供了讨论平台。人际网络中包括有大学教授、学生和不同领域的学生科学社团。科技博物馆还与佩特雷大学的其他博物馆织出了一张非正式关系网⁶,一方面可方便组织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联合展览和活动,另一方面也为将来提供更多开拓的可能性。由此一来,博物馆显然能协助监控环境变化,这在当前环境问题愈发重要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关键(Kelly 2006)。

博物馆还与科学、教育和文化传播等团体建立起强大的人际网络,如中小学创新教育部(Departments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⁷、中小学教育顾问会(Education Consultan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中学自然科学中心(Centre for Natural Scienc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法语协会(French Institute)、合唱团(Chorales)、佩特雷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of Patras Artists)、音乐与艺术团体(Music and Art Groups)、表演艺术团体(Performing Arts Groups),以及欧洲研究者之夜(European Researchers Night)等(Koufou 2014)。博物馆与这些团体合作,共同探索科学文化传播之路。

因此,这些行动都意在促进机构团体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从而加强知识共享。最终它们解决了大学的文化孤立问题,并强化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普遍认知与了解(Rinaldi 2009)。

5 活动“几代人相遇在科技博物馆:记忆推动创造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活动呼应了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小学学生与老师、家长一起和希腊电讯公司的退休员工互动活动,孩子们设计出未来的电话。

6 佩特雷大学官方成立的其他博物馆包括动物博物馆和植物博物馆。

7 文化部、健康教育部、环境教育部。



挑战与机遇

科技博物馆于 2009 年向公众开放, 正值希腊遭遇金融危机之时。虽然博物馆在融入大学和院系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但仍得到了大学和社会的支持。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可持续性。未来的景观应当提升可持续性, 这一点自然不在话下, 也需要在城市化和全球化不可逆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Antrop 200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博物馆馆长们认识到他们成功的关键是如何能应对博物馆的变化 (Kneil 2003)。科技博物馆成功地应对了科技、社会、危机的变化, 并设立了行之有效又符合成本效益的运营规则。博物馆开发出科学文化传播的新途径, 这些途径改变了人们消费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方式, 也在大学和社区间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博物馆有机会影响、挑战甚至改变观众的思考方式, 鼓励他们对重大问题采取行动,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成为更博识的公民 (Kelly 2006)。自建馆以来, 科技博物馆面对过一系列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向社会开放大学, 开放博物馆。佩特雷大学坐落在佩特雷市郊区, 与市中心关联不大。连接各个层级的教育也是颇具挑战的。其他挑战还包括用通俗化的方式来普及科学和技术, 传播以佩特雷大学的学术成果为主的科技知识, 吸引大众走进博物馆参观, 并教育学生和社会观众。在开放以后, 博物馆不得不应对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恰好发生在 2008 年, 博物馆开放的前一年。显然, 博物馆必须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想方设法获得成功。

同时, 自开放以来, 博物馆也迎来了许多机遇。不同实验室和院系已保存有一系列的收藏品⁸。最大和最重要的收藏品是电子工程与计算机技术学院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的通讯设备, 以及科技博物馆常设展览的物理科学仪器收藏品。

专为科技博物馆设计的新楼也正在建造中, 并已经完成了部分工程⁹ (Theologi-Gouti 2000)。一些在职教授和荣誉教授也一直在传递知识和学科经验¹⁰。许多教授也为博物馆的常设展览设计研究, 其他一些人则支持收藏品的文献记录、博物馆策略制定, 以及与公众打交道的战略。有些教授还会参与到项目、研讨会和工作坊等活动中, 为公众做讲座。还有许多志愿者、学生和年轻人, 随时都在准备为博物馆出力。

面对问题和困难

科技博物馆也从一开始便面对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博物馆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自己的楼房、办公室、椅子、桌子、电脑, 甚至没有藏品; 资金匮乏、人手不足, 博物馆专业人员更是难求。博物馆的起点, 满是孤立无援 (Stanbury 2000)。

官僚主义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博物馆的运营需要灵活多变, 以便能够施展所长。但经常连正常的运营都面临着种种问题。大学官方难以接受博物馆, 而大学尚未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即: 博物馆不能作为行政部门, 也不依靠官僚主义, 博物馆有不同的使命和目标、不同的工作计划。

8 大部分在大学最老的院系部门中, 如物理学习、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系、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系、机械工程和航空工程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地质学系。

9 已完成设计的 25%。

10 大部分教授来自物理学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系、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系、教育系和哲学系等。



博物馆团队不得不与校长办公室、教授、院系和行政部门维持关系。教授和学校员工对博物馆的看法曾存在着问题。许多教授一开始认为（现在很少）大学就是研究和教学的地方，他们不希望听到学术遗产或科学技术遗产，或是普及科学技术的说法。博物馆里的孩子和青少年让一些教授感到厌烦。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看法大大减少。如今，佩特雷大学大部分教职员都承认科技博物馆对于大学和社会而言的必要性。

最后的难题是大学社区和社会当中“博物馆文化”（Museum Culture）的缺失。而创立博物馆时遭遇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是需要克服的挑战。

改变大学的文化景观

人类一直在改变环境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因而会重塑景观（Antrop 2005）。面对着挑战、机遇、困难和问题，科技博物馆力求重新定义佩特雷大学的新文化景观，以及其作为大学博物馆在大学社区和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博物馆承担着科学和历史的任务，其做出了许多努力，并为社会提供服务（Arnold 1996）。科技博物馆秉持着以展品为主的原则，展览环境优良。常设或临时展览都是观众首先可以欣赏的内容，观众可以直接触摸展品，这是科技博物馆的特点之一（Clarke 2002）。与大部分科学博物馆一样，科技博物馆结合了互动展品与阐释历史收藏的新方式（Durant 1996）。出于教育目的，互动体验不仅让观众能够触摸展品，也能在心理上进行互动（图3）。展品兼具教育性、生动性和趣味性（Hein 1998）。



图 3

学生参与物理学实验教育活动
照片由博物馆志愿者拍摄
佩特雷大学科技馆版权所有

科技博物馆是否已经成功发展并拓宽佩特雷大学的文化景观？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博物馆已经成绩斐然。科技博物馆正履行着社会责任，协助教育公民和专家学者。自开始运营以来，科技博物馆发挥着大学博物馆的作用，获得了广泛的关注（Kelly 2001a）。博物馆并不仅仅是让观众欣赏玻璃柜内的珍贵展品，观众还能够与展品进行互动，寓教于乐。博物馆还在探索如何持续改进展览的可及性，让更多人享受展览。博物馆利用了新技术、现场讲解、互动实验、艺术与表演艺术等方式，让博物馆和科学技术知识“去神秘化”（demystify），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展览（Caulton 1998）。



因此,科技博物馆吸引了大量观众,大部分儿童、成人和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后都走进了大学¹¹。由于能与展品直接接触,儿童、青少年、学生和其他观众在参加博物馆活动时都为能与“实物”接触而感到兴奋。许多观众在现场就能与展品互动,并从中学习,而青少年和儿童则是在回到教室学习时得到展品带来的启发(Cl Clarke 2002)。

博物馆还能将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技术及大学本身,让大学走向社会。通过博物馆展览,儿童、青少年、学生和公众能具体地、理性地学习,挑战先入为主的概念(Cl Clarke 2002)。显然,在博物馆的自由选择环境当中学习,学习者的兴趣和想法是基础(Falk 1992)。学习需要积极的感知,集中的注意力,知识的吸收,科技博物馆尝试设计出能为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的学习方式。

因此,博物馆发展出与社会强有力的关系,联系了不同层级的教育(图 4),科学技术知识得以普及,佩特雷大学文化服务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上文提及的行动都强化了佩特雷大学作为文化和学习中心的印象,也拓宽了大学的文化景观(Kelly 2001a)。



图 4

大学生与中小学学生之间的互动教育项目“蜘蛛网络城市的冒险”

照片由博物馆志愿者拍摄

佩特雷大学科技馆版权所有

结论

科技博物馆通过使用不同的对话和媒介方式,与大学社区和社会进行互动交流。科技博物馆第一步先与当地社区实现连接,让公众走进大学,了解科技知识;然后连接邻近地区的学校团体和学生团体。通过增进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博物馆成功地提升并转变了佩特雷大学的角色。

如今,博物馆的影响已延伸到希腊大部分地区,既有来自希腊其他地区的观众,也有来自国外的观众。2016 年初,博物馆开展的全国“电子通讯”(Tele-communicate)摄影比赛使博物馆进一步深入社会。该竞赛呼应了当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与文化景观”(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覆盖了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等群体。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大中小学的师生们从前一年的冬天就开始准备了。

比赛的效果斐然,一方面,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到科技博物馆和佩特雷大学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得以收集到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电子通讯的优秀摄影作品。

¹¹ 2009 年博物馆开馆时,观众数量为 10 000 人次;2015 年博物馆观众数量为 42 000 人次。



佩特雷大学的文化景观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还有许多增进与社会联系的工作需要完成。博物馆需要持续设计新的活动来吸引观众,保持社会关注度。博物馆与社会要持续互动,时时更新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最后,要实现转变佩特雷大学文化景观的目标,大学应当建成科技博物馆的大楼,为博物馆提供必要的专业人力和物力支持。

新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新的景观,与文化遗产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嵌入式的(Antrop 2006)。佩特雷大学景观的转变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反作用于大学、博物馆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为大学和社会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通过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方式,其中自然与文化、过去与现在、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相互碰撞,将保护科学技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生活文化的表达,促进社会和大学景观的发展(Rinaldi 2009)。

科技博物馆在结合佩特雷大学以及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后,能利用馆藏资源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公众的休闲时光提供丰富有趣的活动,展现出博物馆作为社会和文化中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Kelly 2006)。

参考文献

- Antrop, M., 2005. "Why landscapes of the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Landscapes and Urban planning*, 70, 21–34, 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DIRECT.
- Antrop, M., 2006. "Sustainable landscapes: contradiction, fiction or utopi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5, 187–197, 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DIRECT.
- Clarke, A., Dodd J., Cooper Greenhill E., O'Riain E., Selfridge L., Swift F., 2002. *Learning through Culture*,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Arnold, K., 1996. "Presenting Science as a product or a process: museums in the making of science", *New Research in Museum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Series*.
- Caulton, T., 1998. *Hands on Exhibitions managing museums and science centers*. London: Routledge.
- Durant, J., 1996. "Science Museums or just Museums of Science." *New research in Museums: an international Series*.
- Hein, G., 1998. *Learning in Museums*. Edited by Kaplan F., Hooper Greenhill. 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lk, J., & Dierking, J., 1992. *The Museum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Whalesback Books.
- Kelly, L.,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useums on their communities: the role of the 21st century museum", *INTERCOM 2006 Conference Paper*.
- Kelly, M., 2001a. "Introduction." In: *Managing University Museums*, ed. by Kelly M. (Paris: OECD), 7-18.
- Kelly, M., 2001b. "Conclusions." In: *Managing University Museums*, ed. by Kelly M. (Paris: OECD), 197- 201.
- Knell, S., 2003.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Museums in the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Koufou, A., & Theologi-Gouti, P., 20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of Patras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Education, Prefecture of Achaia, Greece. An Example of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useos Universitarios Tradicion Y Futuro*. (Madrid: Campus Moncloa), 367-371.
- Rinaldi, M.D., 2009, "Identity and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Safeguard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Cairo, Egypt.
- Simon, N., 2010.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Santa Cruz California: MUSEUM 2.
- Stanbury, P., 2000.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Museum International*, 52(2):5-9.
- Theologi-Gouti, P., 2000. *A new museum in an ancient land: Patras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Museum International*, 52(2): 25-27.



Theologi-Gouti, P., 20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atras: a place for non formal education and experiential approa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Μουσείο Επιστημών και τεχνολογίας Πανεπιστημίου Πατρών (ΜΕΤ ΠΠ): χώρος άτυπης μάθησης και βιωματικής προσέγγισης. Notes of Museology/Τετράδια Μουσειολογίας.

联系方式

Penelope Theologi-Gouti, Architect, Ethnologist (MSC), Responsible for Exhibitions,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Other Activities

Address: Patras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University Campus, Patras 26500, Greece

E-mail: stmuseum@upatras.gr

<https://www.facebook.com/Museum-of-Science-and-Technology-109823479058588/>

Evangelos Vitoratos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s, (PU). Director of of Patras University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eece

Adress: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Campus, Patras 26500, Greece

E-mail: vitorato@physics.upatras.gr

<http://www.physics.upatras/index.php?lang=en>

关键词

Non-formal education, Sustainability, Networking



为沉睡的学术遗产注入生机：西班牙大学与中学案例研究

Isabel García, Luis Mayo, María José Gómez / 文
陈力子 / 译

摘要

古老而有名望的大学和中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正如其文化遗产展现出的那样，也包括杰出人物和学生在校友。科学和艺术的教学造就了重要的科学教育遗产，这些遗产本来的用途或许已经消失，但后来产生的新闻释能够丰富遗产价值，超越其物质存在本身。本文的目的在于为中学和大学探寻现有的联系，通过教育项目协助新知识的创造与分享，唤醒“沉睡的遗产”（dormant heritage）。



引言

本文几位作者最近一直致力于探索西班牙马德里的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和其服务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打算通过研究和传播教育院校中保存丰富的学术遗产，重建首都马德里的教育和文化景观。马德里最古老的高等院校和公立大学的历史收藏品在起源和功能上都有着近似之处。研究这些收藏及其历史时，可以寻找其中的普遍联系，旨在广泛而全面地了解历史、文物及其潜力。院校通常会研究自身的历史和发展历程，但很少有院校会将自身与其他院校联系在一起，除非出于共同目的。共同起源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两种不同学术水平的教育背景下追溯类似藏品的产生历程。而在过去，这一点未被得到强调，因为大学和中学的教育环境差异不大。

它们共同的历史开始于 19 世纪。对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机构的研究，可以清楚显示出西班牙教育体制的演变。在该时期的教育体制下，机构一直在寻求优秀人才，法律举措层出不穷，人们也进行了广泛讨论。法律的快速变化正是由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

许多文献都提出了与欧洲教育院校相匹配的需求。在那些论述中，法国给予了人们许多启发。受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催生了一个教育体制：造就一个平等、公平和自由的社会，其中教育的责任由国家承担，并且作为一项全体公民都享有的权利。这些文献中提到了 1792 年孔多塞（Condorcet）提出的研究报告（Real 2012）。

对自己的成就保持低调，这在西班牙十分普遍。而在此案例中，有必要强调历史学术机构的相关性。在中学内展开了重要的科学辩论，许多教师获得了重要的成就和知名度。并且，这些学校也能够整合有着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教学收藏品。这些收藏品与大学内的收藏品类似，中学已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并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1836—1845 年间，西班牙大部分省份都建立了今天所知的中学。自建立之时起，中学教育就涵盖了人文和科学两个领域的知识，后者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自然历史（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学科，意在强化学生的观察能力，特别是以他们自己的环境为中心。科学教育旨在促进物质进步，协助未来科学职业的发展。当时的趋势是强化科学教育，创建教学实验室并寻求人类进步、文化行动和个人发展（Rodríguez 2009）。1845 年，仅有 25% 的课堂时间用于教授科学，然而到了 1873 年，44% 的课堂时间投入到了科学教育当中（Sanz 1985）。

1821 年的资料记录了一所叫做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的主要大学的建立，该大学为全方位的科学教育而开设了综合性的研究课程。这一做法后来扩大到利马、墨西哥和波哥大的圣达菲等地的大学，他们与西班牙的大学开展了相同的研究（Decree LXXXI of June 29, 1821 General Regulation of Public Instruction）。1836 年，中央大学迁至马德里。1845 年，西班牙设立了皇家学位，只有这所大学能开设博士课程并授予博士学位（article 77）。而那时，西班牙只有 10 所大学，分别为 1 所中央大学和其他 9 所不同地区的大学。



如上所见，西班牙以法国为模版（Hernández 2008），对教育法（1857 年 9 月 9 日《公共教育法》，Public Instruction Law）作出一些修改后建设大学。一般而言，西班牙实行大学精简制度，国家拥有学习课程的完全控制权（Álvarez 1972, 329—340）。1857 年法律第 14 条中显示出对科学学习不断增长的兴趣：“作为拓展并完善科学进程的有效手段，教育部将发展学院、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并将为高层次科学教育建设新学校，与现有学校尽量衔接。”1857 年，中、高等教育院校的学术和管理部门彻底分离。然而，圣伊西德罗高中（San Isidro High School）被合并到大学中，直到 1874 年仍受国家管理。到了 20 世纪，德国大学也成为了西班牙高等教育所需改革的模型。德国教育体制倡导人的整体发展，知识的获得和增强研究能力，这些都体现在 1993 年 3 月 17 日的西班牙大学改革项目（Spanish Project of University Reform）中。西班牙政府也设立了众多奖学金为前往德国的留学生提供资助（Gómez 2009）。

最古老的高中和最大的大学

马德里和西班牙的中心是最古老的高中和最大的大学诞生的地方。圣伊西德罗高中有着西班牙最古老教育中心的殊荣，拥有自 14 世纪开始的历史，首先与维拉研究中心（Estudios de la Villa）关联，随后 1603 年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建立，1625 年耶稣会（Jesuits）成立皇家研究中心（Centre for Royal Studies）。1725 年，贵族神学院（Seminary of Nobles）建立，用以训练国家的统治精英阶层。1767 年，国王卡洛斯三世（King Carlos III）驱逐耶稣会，将皇家研究中心改建为普通教育机构，以促进国家的复兴。

1837 年，大学完成了向马德里的迁移，成为了中心大学，两所最重要的中学也隶属大学。大学与圣伊西德罗学院（San Isidro Institute）共享教室、橱柜、实验室、教学材料、科学收藏品和教学人员，大学的建筑学、哲学、医学和艺术学院都设在教室中。正如学者科尔巴乔（Corbacho, 2004: 34）所述，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原中央大学）是皇家学院的真正继承者，在迁移到蒙克洛校区（Moncloa campus）以来，她带走了维拉研究中心的大部分文化遗产。在这些收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书目资产。

学校里的教师教授基础中学课程，大学讲师则教授高等课程。大学和中学都由哲学系主任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管理。成为高中教师是成为中央大学讲师的第一步，最终能成为大学讲师需要杰出的成就。例如，一位自然历史教授和研究所所长桑德里奥·德佩雷达（Sandalio de Pereda），他一开始是医学院讲师，2 年后获得了巴利亚多利德大学（University of Valladolid）自然历史系主任的职位。6 年后他成为了圣伊西德罗学院教授，教授 33 门课程，任职主管 16 年。他在自然历史系的发展中是一名关键人物，出版了众多教科书。他还是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墨西哥科学、医学、自然历史学界的一员。



图 1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原中央大学）
的外墙（1920—1930 年）
综合档案馆 AGUCM SG/1497.01



遗憾的是，在 180 年以后，学校的起源已经鲜有可考之处。大部分院系从马德里中心迁移至大学城。大学保留了马德里中心的部分历史建筑，包括历史图书馆和旧礼堂，以及一些收藏品。

科学教育方面的一般收藏品

虽然一些教师在学校和大学中讲学，但使用收藏品会更容易建立学校之间的联系。笔者将本文的重点放在科学教学，整体性的物质文化，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举措等方面。

从历史上看，中学更清晰地见证了教育收藏品和博物馆的创建。这些收藏品保管在它们起源的地方。其中的历史和学术遗产可分为四大部分：建筑、图书馆、自然历史收藏和物理化学收藏。在大学里，这些收藏源自不同的地点和院系，但藏品在搬迁中遗失了。

学校的目标是“好的教育”（good education），即实用的，基于直观性、主动性和实验性的教学方法。《圣伊西德罗学院回忆录》（*Instituto San Isidro Memorias*）一书陈述道：

“由于大部分学生年龄小，就必须指导出好的成果。课程要做到实用性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丰富的展示手段。把实验性的课程变成理论性，只能使学生记住文字而不是表达观点，这就会导致学生的挫败感，也干扰了他们智力的主动发展。”（*Instituto San Isidro Memorias*: 1860-1861, 53）

教师们对最好的科学材料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因此促成了收藏室的设立。首先收集的是物理和化学的藏品。

1860 年圣伊西德罗学院开设了第一个与自然历史相关的自然历史收藏室。藏品日渐增多，1877 年当桑德里奥·德佩雷达（Sandalio de Pereda）成为主任时，收藏品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当时，自然科学领域著名教授曼努埃尔 / 玛丽亚·何塞·德加尔多·洛佩兹·德内拉（Manuel/ María José de Galdo López de Neira）负责创建收藏室并前往巴黎购置教学材料。国家为学术机构提供了基本的教学材料目录，但大机构可以购买到更多和更昂贵的材料。教授在巴黎买到了奥苏人（Auzoux）的全套模型和大批动物学、植物学模型复制品（Aragon 2012: 105—107）。加尔多（Galdo）也出版了《自然历史手册》（*Manual of Natural History*），在教学中该手册被使用了近半个世纪。教授在获取收藏品的同时，也在法国作品的启发下撰写教科书。圣伊西德罗学院为自然科学收藏品提供了适当的保存空间。收藏室内装有两排玻璃展柜，陈列出动物标本和教学模型。室中央两个台式展柜中陈列有矿藏和化石标本，中间的高展柜展出奥苏人模型，作为中心展品。学者马丁（Martín）对不同阶段的收藏演变历史做了调查研究（2012, 2013）。令人遗憾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收藏室被进行改造，布局被重设，藏品则被分散到了其他地方。



图 2

19 世纪圣伊西德罗学院自然历史
收藏室

IES San Isidro 拍摄



随后,大学开始收集教育和科学藏品。1860年,中央大学拥有6个系和9所学院。科学学系被分为3个部分:数学与物理、化学、自然科学。数年后,数学和物理分离,学系又多了一个。科学教学总体来说缺乏实践过程,只有自然历史部分有合适的实践课程,开展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Natural History Museum)。然而,如果对比两所学术机构的藏品,就会找到相同的理念。两所机构藏品内容相同,但大学的藏品数量更多。

中学和大学也与重要的科研机构有所联系,比如自然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西班牙自然历史学会(Spanish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皇家天文馆(Royal Observatory)和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al Gardens)等。西班牙皇家自然历史学会(Royal Spanish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成立于1871年,是一所学校教师创建的机构,汇集了西班牙顶尖的自然科学家。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对自然的学习与研究、知识的传播、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对自然科学教师的培训。

自然科学博物馆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博物馆起源于18世纪,一开始是皇家自然历史收藏室(Royal Cabinet of Natural History),其建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科学发展。从成立至今,基本目标都是为中学和大学提供教学资源。尤其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博物馆在物种与自然标本的藏品形成与分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些藏品最后都送到了这些教育中心。由于这种合作方式,西班牙全国各地都设立了收藏阁与博物馆,这些场所在自然科学的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artín 2014)。

1885年,皇家自然历史学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旨在改进西班牙自然科学研究,但直到1900年才被重视。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院系内只有自然科学部分的实践课程。科学学系的其他部门花了更多的时间设置实践课程(Baratas & Fernández 1992)。皇家学会还提出了措施,促进大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科学研究。

今天,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是西班牙主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并与大学合作。此外,西班牙皇家自然历史学会自1910年以来便落户博物馆内。大学藏品仍分散于不同院系内。

保护遗产

丰富多样的遗产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教育和科学价值。一般而言,收藏室都会命名为博物馆,以显示其重要性。藏品与其他国家的发现类似,然而,西班牙教育改革历史的独特性形成了本国的现实情况。西班牙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遗产的重要性和对其保护的必要性。而为了遗产长久保存,必须讨论如何对其保护而非宣传,这固然有些令人意外。

对于学院而言,有必要创建全国历史学校遗产保护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the Heritage of Historical Schools)。虽然第一次会议于2007年召开,但直到2010年协会才正式成立。协会目标包括修复遗产,不论是文献、传记、科学或建筑方面的;收集并编录遗产;建立学校间科学和教育合作。

不幸的是,协会未能达成遗产保护的目标。协会虽然非常活跃,但实际上对遗产的真正保护来自高校内部,遗产保护面临着保存藏品在原环境并确保其保存完好方面的挑战。此外,还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宣传,以及来自公共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需要明白遗产对于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并赞同把遗产存放在原来的背景和更合适的条件下。



教育和科学博物馆

如今，沉睡的遗产已准备焕发新生。20 世纪 90 年代，圣伊西德罗学院提出建议，建造展览空间来展示条件不佳的收藏品。但主要问题是要找到合适的场地。20 年后，到了新世纪，学院达成了建立教育和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的目标。学院内部提出了建议和措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动力，学院管理层提供支持，教师和学生则负责实施。选择的空间是曾经一度废弃不用的 17 世纪的楼梯间。

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在于 2 个协会和 1 个项目。除了全国历史学校遗产保护协会，还有由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赞助的教育中心团体与网络协会（Agrupaciones y Redes de Centros Educativos / Groups and Networks of Educational Centers, ARCE）。协会项目旨在建立合作渠道，共同协作促成西班牙国内学校和教育公共机构网络的形成。协会目标是建立合作项目，由所有的中心或参与机构负责实施。

项目名为“1837—1936 年马德里中学文化遗产中的科学与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Madrid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1837—1936），简称为 CEIMES。该项目是马德里自治区（Community of Madrid）研究团体间的活动项目，大部分是大学团体，由创新部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Ministry of Innov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Madrid）提供为期 3 年（2008—2011）的资助。项目旨在保护、提升科学和教育遗产，利用新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教育革新知识，实验科学作为教学的核心。大部分藏品都进行了编目并在互联网上公开。通过这个项目，一本名为《马德里历史学校中的科学、教育和遗产》（Science, education and heritage in historical schools in Madrid (1837—1936)）的重要书籍得以出版（López-Ocón, Aragón & Pedrezuela 2012）。该书分为 2 个部分，第 1 部分的《被遗忘遗产的新生》（New life for a forgotten heritage）尤为重要。

历史悠久的皇家楼梯中收藏了学校关于教育遗产的常设展览。展品包括：书籍、地图、照片、学校记录、插图和学生作业样本等，来自生物和物理实验室的动物标本“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由著名的动物标本剥制师贝内蒂克瓦·维维斯（Benedicto Vives）兄弟制成；以及 19 世纪奥苏博士（Dr. Auzoux）制作的动植物解剖模型。如学者马丁所述，楼梯间逃过了 20 世纪的改革，成为博物馆叙述话语的组织者。展览案例和文献被视为通往知识和智慧道路的隐喻。这条路并非笔直的康庄大道，而是螺旋式的，开启了多种视角，最后的顶峰是收藏历史中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奥苏人。



图 3

圣伊西德罗中学教育与科学博物馆
的常设展览

Luis Mayo 拍摄



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利用遗产进行教学，因而在学生和环境之间创造出情感联系。近年来，各种组织的活动都在尝试让学生参与对学校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以期评估遗产的重要性和教育中心的历史意义（Martín 2012, 130-131）。最新的一个合作项目对保存在圣伊西德罗中学和康普顿斯大学兽医博物馆（Veterinarian Museum of the Complutense University）中的奥苏模型进行了研究、修复和宣传。

博物馆的延伸

事实上，博物馆的延伸更像是一种扩散，可能是由于藏品作为教学元素重要性的下降，以及对藏品作为遗产认识的缺乏所导致的。博图梅（Bertomeu）等学者指出，最优秀的教育收藏就是圣伊西德罗中学的收藏（2011）。其中一些藏品源自 18 世纪，由该校教师制作，因而相当独特。尽管藏品丰富，近年来还是遭遇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1995 年，马德里自治区的植物标本馆（Herbarium with the Plants）迁移至皇家植物园。1985 年，大约 850 件物理和化学收藏室的仪器搬迁至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进行保存和修复。搬迁的原因是保存空间和维护的不足。随后 1998 年，收藏品意外地成为了新成立的国家科技馆（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藏品，大部分收藏都在仓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藏品的来源说明都已流失，包括原本的教育目的等。一些藏品现在仍是 2004 年开馆的名为“收藏室”（cabinet room）的博物馆常设展览一部分。

博物馆展出了大量（166 件）的实验科学物品，主要来自 19 世纪，展现了诸如气象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声学、力学等不同科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之路。展品来自圣伊西德罗中学和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物理学系，展览对于两所学府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经过 180 年后，他们似乎发现了在公共空间展示互补藏品是呈现科学教育相似理念的精神延续。但是，藏品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对待。

大学展品的标签上写着“由物理学系借出”，圣伊西德罗中学的展品标签上只写着“来自……”。悲哀的是，这可以被理解为，这些展品不再属于学校了，虽然藏品在博物馆展出。学校内有一种普遍感觉是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因为这些展品可能不会归还。据学校老师的说法，博物馆也失去了原本的任务、独特性的特点和教学的功能，还面临着失去历史性的风险（Martín 2012, 154）。

未来

博物馆项目是成功的，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校要么有常设展览，要么偶尔组织临时展览突出她们的历史、艺术和科学遗产。但显然，这些活动并不足够。必须要用一种更综合、更通俗的方式认识问题，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致力于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认识到教育院校的重要性，博物馆需要找到其中的联系，唤醒她们的历史和收藏品。

为了建立纽带，必须找到真正贡献于教育和科学的基石，其目标是不要失去与过去的联系以及师生们取得的成绩。有利的环境促成会议的召开，从而促进了合作的持续。圣伊西德罗中学博物馆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美术系（Fine Arts Faculty at 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合作项目刚刚启动，这传递出一个不同而互补的科学观点。两所学府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必须强化中学和大学教育的联系。学生、教师和学者们正一同努力，建成学府之间的桥梁。



在学习空间内研究真正的展品，结合它们使用的情景空间，是一种催生人文知识、社会良知的极佳社会工具（González & Baratas 2012, 97）。一旦产生积极的结果，这种做法必须继续并突破空间限制，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之中。



图 4

圣伊西德罗中学奥苏解剖学的藏品

标本蛇头

Daniel Rivera 拍摄

结语

中学在教育和启发西班牙社会精英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圣伊西德罗中学是第一所建立的中学，最能反映出中学教育和社会的历史。大量学生成为西班牙历史的一部分：政治家、哲学家、音乐家、记者、作家，其中包括 4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外，一些教师也是杰出的科学学者。这种人类的潜力已反映在非常宝贵的历史和教育遗产中。

另外，在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大学模式都非常稳定，中央大学是其他西班牙大学的典范，也折射出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主要景观。大学许多教师也承担着政治责任（San Andrés 2015, 17）。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关系是多样化的，但其中的遗产、讲解和教材具有共同的特点。

在最近的几年里，人们对于所有教育层面的历史和遗产都愈发感兴趣。1995 年，在中学成立 150 年后，人们组织了不同的活动和展览，以庆祝这一重要纪念日。从那时开始，人们就承诺要继续保护、传播宝贵的建筑、科学和文献遗产。已经有了一些有趣的成果，但许多活动和举措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未能唤醒沉睡的遗产。只有跨越学府围墙的项目才能够真正起到作用。显然，多学科融合可以带来许多故事和理念，以丰富历史材料。因此，重要的是要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来恢复教育环境之间的关系。



致谢

PIMCD 项目 Innova-docencia nº 220, 2016, 学术遗产作为未来科学生涯发展的一种工具。

参考文献

Álvarez de Morales, A. 1972. Génesis de la universidad española contemporánea,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Administrativos.

Aragón, S. 2012. Historia de objetos que cuentan historias: plantas, rocas y animales en los institutos históricos madrileños. In: Ciencia, educación y patrimonio, eds. L. López-Ocón, S. Aragón & M. Pedrezuela (Madrid: Ceimes, CSIC and Comunidad de Madrid), 105-116.

Bertomeu Sánchez, J.R. et al. 2011. Las colecciones de instrumentos científicos de los institutos de enseñanza secundaria del siglo XIX en España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30: 167-193.

Bertomeu Sánchez, J.R et al. 2010. Los Instrumentos Científicos de los Centros de Enseñanza Secundaria en España: historia, estado actual y futuro del patrimonio científico educativo. In Coleções Científicas Luso-Brasileiras: Patrimônio a ser descoberto, eds. Granato, M. y Lourenço, M.C. (Rio de Janeiro: Museu de Astronomia e Ciências Afins - MAST/MCT), 15-46.

Corbacho, J. 2004. Una pequeña gran historia. Guía breve del Instituto San Isidro. Madrid: Publicaciones San Isidro.

Condorcet, J.-A.-Nicolas de Caritat. 1792. Rapport et projet de décret sur l'organisation général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présentés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s 20 et 21 avril 1792 impr. par ord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1792.

Fadón Guerra, I. 2008. IES Cardenal Cisneros. Madrid. CEE Participación Educativa 7: 55-59.

Gómez Sánchez, T.F. 2009. La universidad alemana, una referencia para el Proyecto de Ley de Reforma universitaria de 1933 In: Influencias alemanas en la educación española e iberoamericana (1809-2009), Coord. Hernández Díaz J. M. (Salamanca: Globalia Ediciones Anthema).

González Bueno, A. & A. Baratas Díaz 2012. Los desvanes de la memoria. Museos y colecciones científicas en la universidad. In: Ciencia, educación y patrimonio, eds. L. López-Ocón, S. Aragón & M. Pedrezuela (Madrid: Ceimes, CSIC and Comunidad de Madrid), 93-101.

Hernández Díaz, J. M. (ed.) 2008. Influencias francesas en la educación española e iberoamericana (1808-2008), Salamanc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Instituto de San Isidro.Ca. 1876. Cursos académicos de 1858 á 1875. Madrid Colección de memorias.

Martín Albaladejo C. 2014. El Museo Nacional de Ciencias Naturales y la enseñanza de las Ciencias de la Naturaleza en España: las colecciones como herramienta didáctica. Boletín de la Real Sociedad Española de Historia Natural. Sección Aula, Museos y Colecciones, I: 7-24.

Martín Villa, R. 2013. Aspectos de la enseñanza de las ciencias naturales en el Instituto San Isidro y de su gabinete de historia natural. In: El Instituto de San Isidro: Saber y patrimonio: apuntes para una histori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75-102.

Martín Villa, R. 2012. Actividades de difusión del patrimonio histórico educativo. El museo del Instituto San Isidro. In: Ciencia, educación y patrimonio, eds. L. López-Ocón, S. Aragón & M. Pedrezuela (Madrid: Ceimes, CSIC and Comunidad de Madrid), 151-158.



Real Apolo, C. 2012. La configuración del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l en el siglo XIX: Legislación educativa y pensamiento político. *Campo Abierto*, 31,1: 69-94.

Rodríguez Guerrero, C. 2009. El Instituto del Cardenal Cisneros de Madrid (1845-1877). Madrid: CSIC.

Rodríguez Guerrero, C. & L. López-Ocón Cabrera. 2012. El Instituto del Cardenal Cisneros: la puesta en valor de un patrimonio singular. In: *Ciencia, educación y patrimonio*, eds. L. López-Ocón, S. Aragón & M. Pedrezuela (Madrid: Ceimes, CSIC and Comunidad de Madrid), 117-134.

San Andrés Moya, M. 2015. Los museos y colec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Origen, peculiaridades y situación actual. In: *Libro de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Museos universitarios. Tradición y futuro*, ed. I. García (Madri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15-39.

Sanz Díaz, F. 1985. La segunda enseñanza oficial en el siglo XIX (1834—1874). Madrid: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iencia.

联系方式

Isabel García, Vice-Dean of Research and Ph.D. Programs Fine Arts Faculty

Addres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C/ Pintor el Greco, 2, Madrid, 28040, Spain

Email: museoig@ucm.es

Luis Mayo, Assistant Professor, Fine Arts Faculty

Addres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C/ Pintor el Greco, 2, Madrid, 28040, Spain

Email: lmayoveg@ucm.es

María José Gómez, High School Art Teacher

Address: High School Institute, IES San Isidro, C/ Toledo, 39, Madrid 28005, Spain

Email: mjose.gomezredondo@educa.madrid.org

关键词

Academic collections, High school heritage, Science cabinets

论文



艺术与工艺：收藏的多义与活力

Marie-Sophie Corcy, Lionel Dufaux, Dominique Ferriot / 文
吴悠 / 译

摘要

倚靠强大的教学和研究背景，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le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始终坚持从多角度寻求自身的定义。为了支持法国工业发展，确保新的发明创造以及应用科学领域的进步能够转化为现实，围绕其前身国家工艺学院（le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的教学任务，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收藏逐渐着眼于历史性，旨在构建法国技术领域的历史。如今，这家活跃的研究机构根据藏品种类和作用所铺就的展线，讲述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历史。2000 年，博物馆在翻新后开门迎客，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展览和特殊的媒体展示方式提升藏品价值。



引言

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 1794 年的国家工艺学院，学院建立的目的是“优化国家工业”（perfectionner l'industrie nationale），因此博物馆也有着良好的教学与研究基础。建馆以来，其收藏不断扩大，品类涵盖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发明创造（实物、模型、样品、绘画和素描、照片）。通过这些收藏，围绕机器而产生的“模仿艺术”（art d'imitation），结合智慧与技艺的艺术得以宣扬（CORCY 2015）。在欧洲，国家工艺学院一直是教学与收藏相辅相成的楷模，向公众展示知识、发明带来的经济效应。展厅希望呈现的是¹：以博物馆的视角来展示发明创造如何被使用、如何被回溯。凭借藏品的高质量和严密性，博物馆吸引着各种人群：包括文化遗产专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历史学家、工程师、博物馆专业人士等，当然也有好奇的观众，以及希望从参观、讲解、工作坊等展现方式中有所收获的人群。

发明创造的应用 / 收藏的应用

收藏永远是博物馆的关键所在。藏品的保存如同博物馆的“身份识别”，这一点在科学技术博物馆、展示中心类机构中尤为明显。研究、管理和保管都能促进博物馆在学科和文化方面的决策。对于全球博物馆机构而言，皆是如此（FERRIOT and LOURENÇO 2004）。

工艺美术博物馆近期的翻新工程以收藏历史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出发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构职责，从而挖掘出藏品的本质。19 世纪国家工艺学院展厅首要的收藏标准是应用：发明创造的应用，即应用科学。展厅向博物馆的演进实际上是藏品更新减少、发明节奏减缓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以博物馆的眼光审视收藏。这种回溯式的视角源于技术方面的进步，尤其是 1889 年世界博览会（l'Exposition Universelle）上举办的各种纪念仪式（CORCY 2013），甚至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法国技术史的发展都卓有贡献。发明家的形象也逐渐明朗：在解说装置、半身像和肖像的配合下，充满智慧的人类与充满创意的产物以发明物的材质为线索，沿两侧展厅一一铺开。

博物馆作为藏品的发明创造的应用，其实际的应用功能逐渐淡化，文化遗产成为它们新的属性，并形成一种更为“通用”的协调感，避开了国家强令其成为解决工业问题机构的命运。国家工艺学院博物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自身的专业性，建立了许多“馆中馆”：预防工作意外及工业卫生博物馆（Musée de la Prévention des Accidents du Travail et d'Hygiène Industrielle, 1904 年），摄影及电影博物馆（Musée de la Photographie et du Cinéma, 1927 年），电话和电报画廊（Galerie de Téléphonie et Télégraphie, 1920 年），铁路厅（Salle des Chemins de Fer, 1942 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博物馆的职责再次得到明确，并于 1963 年更名为“国家技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Techniques）。

¹ 法国国家工艺学院，发明与发明者：国家工业的应用与经验 / 技术史的产生。科学制造与艺术制造研讨会，Mudam Luxembourg，第 15-17 页，2015 年 10 月（未正式出版）。



21 世纪初,“应用”这一标准再次成为了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改建原则:博物馆本意是体现技术的历史和现状,但工艺美术博物馆则试图推广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其如何为公众所接受的历史,馆内关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的收藏在数字技术和非物质化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也显得尤其重要。工艺美术博物馆希望凭借各个“领域”之间的互补,充满创意的多角度互动、人工模型,以及受其他博物馆机构启发而设计出的媒体系统,来引发更多公众对其主题化、编年化常设展的反思。这个看似冒险的展示理念却包含着工艺美术博物馆对科学技术文化机构本位的思考:收藏永远是制胜法宝。



博物馆机械展厅,地面铺设矿厂专用的狭轨铁路,充当连接各个展厅和阶梯的地面标识
国家工艺学院工艺美术博物馆/
M. Favareille 拍摄

工艺美术博物馆改造项目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整理庞大而杂乱的藏品,这在博物馆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任务之艰巨足以载入该馆史册。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库房始建于 1994 年,位于巴黎市圣马丁街。库房建造在一个废弃的工业遗址之上,这在当时为保存馆藏提供了最佳空间(1994 年的国家技术博物馆)。考虑到对建筑物原貌的保护和对收藏的可达性,库房的功能十分简单:作为开放的资源中心,让搜索者能够接触那些未能在馆内展出的藏品(PICARD 1996)。在 1994—1998 年,库房的各个房间、阁楼、地下室为 200 余年来收集的 8 万多件藏品提供了展示场所,但也为收藏的清点带来难题。收藏的可达性首先与库房放置区域的设置密切相关,同时还要兼顾不同类型藏品的保存需求,以及借鉴工业生产中常用的信息化定位系统(每件藏品都带有条码,便于追溯藏品位置的移动)。此外,凭借专有的学术化收藏细目,藏品能够在博物馆的专业背景下得到详细记录:藏品的鉴别、发明者或建造者、发明创造的背景以及与其他藏品是否有承上启下的关系等。



1994 年建造的位于巴黎圣丹尼
的工艺美术馆库房
国家工艺学院工艺美术博物馆 /
L. Boegly 拍摄

收藏细目的背景信息数据库来自对百万件藏品细致的鉴定，以及对历史档案的分析整理。其中包括原有的收藏细目、各种（不完全的）盘点清单、不断出版的藏品图录，还有各种专利证书、流传下来的历史记录（著作、期刊、论文和通讯）。数据库是藏品管理和研究的重要工具。自 1998 年² 开放网上藏品查询系统以来，数据库已成为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对外窗口，让博物馆收藏“走出高墙”，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获得重生。

背景信息将收藏的优势与弱势展示出来，为博物馆制定藏品管理政策提供了依据。藏品管理围绕收藏的丰富与拓展、预防性保护和修复等方面展开。相关的学术性争议因为展品不同的地理位置：展厅与库房，而显得愈加复杂。库房无疑是最适宜开展学术研究的地方，研究成果反过来对于藏品管理也有所助益。通过对藏品管理历史的研究，背景信息得到逐一确认，例如某件藏品进入库房的具体日期，而这些都是清点收藏得出的直接成果。同时，这也为以技术为标杆而进行的全新文物征集政策提供了基础，赋予当代人以回溯的视野来收藏在技术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或最有意义的文物，使收藏体系更为全面。这种征集政策将成功的“典范”与未成功的案例放在一起重新思考，也借鉴了著名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对于人与机器，以及“技术发生谱系”的思考（BONTEMS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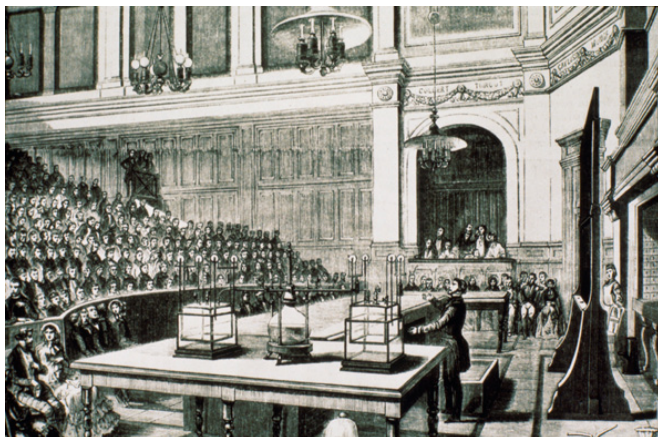
工艺美术博物馆管理模式也为大学博物馆的藏品管理提供了基石。背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预防性保存是建立科研和文化政策的前提，保证藏品既能回溯历史，又能通过不断征集来使博物馆的未来充满活力。通过现行立法，尤其是《法国遗产法典》（Le Code du Patrimoine），工艺美术博物馆以“法国博物馆”（Musée de France）的名义在法律上确立了对藏品的保护权。在这个背景下，博物馆亦能享受到法国文化部（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给予的学术和技术指导，特别是文物清点操作时的背景信息收集、修复。

2 工艺美术博物馆是法国第一家开设网站的博物馆，其网站开设于 1994 年。



传统和研究的应用

工艺美术博物馆在研究领域极具大学博物馆的特性，从而有别于其他博物馆。在建立之初，国家工艺学院就致力于将教学、研究、知识传播和馆藏发展协调起来。国家工艺学院所创立的认知模型，当时被阿尔济耶男爵（le Baron Alquier, 1752—1826 年）³ 认为更加强调“事实科学”，旨在连接不同的知识领域。展厅、阶梯教室或者为了方便运送展品而铺设的狭轨铁路，共同营造出特征鲜明、融会贯通的气氛，以此向技术领域的先驱们致敬，打造“实践行动保存地”的神圣感。



1847 年应用化学教授欧仁·佩里格（Eugène Péligot）在课上演示水的合成实验
国家工艺学院工艺美术博物馆 / 国家工艺学院照片工作室

在整个 19 世纪（20 世纪则更甚），学院内的教授通过向巴黎的建造师们定制“教具”，在知识界和世界博览会评委会（les Jurys d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担任专业职务，利用自身资源促成捐赠等行为来参与收藏的拓展。收集而来的藏品或者是有利于他们在实验室内的研究，或者是有助于他们在阶梯教室的授课，也有些藏品直接进入展厅（DUFAUX 2015）。在许多学科部门（例如机械、画法几何、纺织、应用物理、玻璃与瓷器等）都有不胜枚举的实例。收藏细目也从实验室或教授办公室的工具转为公共展厅所用。国家工艺学院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始终对外公开。关于影视技术（Téléphonovision）⁴ 的课程（1938 年）以及随后的公众讲坛（1941 年）在 20 世纪有着重大意义：实验室利用博物馆馆藏进行研究，并不断扩大与电视机相关的收藏；欧仁·欧吉纳德（Eugène Huguenard, 1881—1954 年）和安德烈·迪迪埃（André Didier）都曾使用过勒内·巴特利米（René Barthélemy）1935 年的机械电视摄影机（la caméra de télévision mécanique）⁵，以及埃菲尔铁塔电视电影发射机（de l'émetteur de télécinéma de la Tour Eiffel, 1938 年）上的尼普科夫圆盘（disque de Nipkow）⁶。与此相反，图像与摄影艺术展厅（la Galerie des Arts Graphiques et de la Photographie）在 1881 年成立，并通过 19 世纪 90 年代的公开会议与法国摄影协会（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otographie）建立联系，并曾试图建立关于摄影的公众讲坛。在这一时期，实用艺术、电学和铁路方面的公众讲坛都或多或少获得了成功。

3 夏尔-让-玛丽·阿尔济耶，关于国家工艺学院的报告，法兰西共和历四年（1798 年）雪月 27 日版，国家印刷厂。

4 “影视技术”（Téléphonovision）一词由让·佩林（Jean Perrin, 1870—1942 年）在 1938 年首次提出，见于《影视技术课程选拔委员会报告》第 2 页，1938 年 6 月 3 日（CORCY 2014）。

5 藏品号 20807。

6 藏品号 20823。



双曲抛物面教具：由 Pixii 父
子公司为奥利维耶·泰奥多尔
(Théodore Olivier) 教授于
1830 年制作的用于画法几何教
学，藏品号 4439
国家工艺学院工艺美术博物馆 /
S. Pelly



公众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工艺学院教学的对象，在学院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819 年，为了在工业革命时期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院开设了高等教育课程。1849 年出现了每周日举办的“派遣课程”(leçons détachées)，参加对象为工厂主、工头和工人 (FONTANON and PESTRE 1994)。分配制的大众讲座随之举办，20 世纪初还出现了在展厅内进行的“参观讲座”。传播研究成果这一理念通过不同形式满足着观众需求。2000 年，国家工艺学院建立了法国百科知识大学 (UTLS)。

藏品的历史让人们能够多方面、多层次了解收藏的利用价值。人们对藏品构成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机构 200 多年来的历史而言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如今为了收藏的可达性和便于管理，加入各种工具而使相关研究成为可能。这项工作目前已进行了 15 年，通过学院与法国国家档案馆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合作举办的 3 场国际研讨会⁷，一套结合实践经验、机构历史、技术历史⁸的方法论得以传播。这些研究工作主要关注创造发明以及代表了这些创造发明的人工制品，对藏品的状况和物质性提出质疑，并通过机构使命的变革回顾机构的发展史，最终与工业史、社会性联系起来。同时，也融汇了包括历史学、艺术史学、认识论以及博物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甚至解决了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分阶段研究作为理解藏品的关键所在提供了可能性。2015 年与卢森堡现代艺术博物馆 (Mudam-Luxembourg) 合作举办的展览《地球仍在转动》(Eppur si Mouve)⁹ 横跨艺术与技术两界，将技术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交由艺术家来思考，正是多领域合作思路的实际展现。

7 研讨会论文集《Cabinets de curiosités, collections techniques et musées d'arts et métiers, Origines, mutations et usages, des Lumières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 (Cnam)，Centre Maurice Halbwachs (EHESS) et Université d'Evora (CIDEHUS)，2011 (未公开发行)。

8 Marie-Sophie Corcy, 通讯稿《Méthodologie et sourc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constitution d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du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séminaire Penser / classer les collections techniques, Liliane Hilaire-Pérez (EHESS, 巴黎七大), Sophie Archambault de Beaune (里昂三大), Valérie Nègre (巴黎高等建筑师学院), Fabien Simon (巴黎七大), Christiane Demeulenaere-Douyère (首席研究馆员), Koen Vermier (CNRS), Céline Trautmann-Waller (巴黎三大), 2014 年 3 月 6 日。

9 《地球仍在转动——艺术与技术的融汇领域》，卢森堡现代艺术博物馆，工艺美术博物馆，2015 年。



征集文物的思路对之后的展品使用至关重要。馆内来自公众的文物，收藏模式大多和卢米埃兄弟（Lumière）的电影机相同，是为了展示技术本身，取决于发明人或建造人在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件袖珍式柯达折叠相机（Vest Pocket Autographic Kodak）¹⁰ 的入藏，并非是其和技术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捐赠者本人的经历。袖珍式柯达折叠相机在一战期间深受军人的喜爱，被誉为“军中柯达”（Kodak du soldat）。捐赠者在赴前线时，他的母亲将此相机赠与他。从这件藏品可以了解到，使用者与其背后的社会意义也是博物馆征集文物的考量标准。1953 年，博物馆入藏了一件电视接收器（récepteur de télévision）¹¹。当年正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这项盛事使整个法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激增，同时为了在全欧洲推广电视机，而不断革新技术，规范化技术标准。同时，文物拥有者与国家工艺学院的紧密联系也促进了捐赠的发生，有的捐赠者正是学院过去的学生¹²。博物馆至今仍定期开展征集活动，每年都对一些征集对象进行评估，显示出博物馆对其收藏的用心。公众的参与以及博物馆的评估标准对于藏品的丰富起到了重要作用。

亦可从其他方面理解研究行为。由收藏而展开的议题增强了多个领域的准则。而关于收藏的学术性和技术性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连接起大学博物馆和用于教学的藏品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工艺学院，收藏被视为工业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交叉点。自 1950 年起，包括贝哈德·吉尔（Bertrand Gille, 1920—1980 年）、莫里斯·多玛斯（Maurice Daumas, 1910—1984 年）、伊夫·德孚日（Yves Deforge, 1929—1997 年）、弗朗索瓦·卡隆（François Caron, 1931—2014 年）都践行着这一理念，并将其视为学院的准则。对于相关准则的了解成就了各类协会以及知识界围绕技术和工业类博物馆来宣扬工业遗产的共识。国家工艺学院的技术史文献中心（CDHT）正是法国工业遗产考古学会（CILAC）的创建成员之一。学会在 1979 年创建的初衷就是为了彰显法国工业遗产的价值。

莫里斯·多玛斯曾是助理研究员（1947 年）、博物馆技术首席服务人员（1960 年），之后成为了国家工艺学院技术史教授（1969 年）。他致力于将法国及法国以外的技术类博物馆和研究者连为一体。同时，凭借自己的专业学识，一直坚持提倡将国有仓库通过政策途径转化为博物馆，例如查维里（Jarville）的铁博物馆（le Musée du Fer）和波里米尤·奥蒙道尔（Poleymieux-au-Mont-d’Or）的电博物馆（le Musée Ampère）（JANIN and SIMEON 1999）。在多玛斯的部分出版物以及他与外国研究人员的交流中，都显示出对工业遗产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同样体现在他通过捐赠或仓库来扩充收藏的政策中，以及根据“板块”（sections）来改变展厅以促进不同技术领域的相互融合。

鉴于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藏品研究项目对档案学的意义，巴黎第四大学（Paris IV-Sorbonne）历史学家、当代史教授弗朗索瓦·卡隆，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国家工艺学院以及巴黎八大（Paris VIII）的团队合作，开设了技术史方面的专业课程。弗朗索瓦·卡隆是博物馆改建期间技术委员会的关键人物，指导着项目进程。他围绕“技术系统的活力”（la dynamique des systèmes techniques）这一主题，根据贝哈德·吉尔的一系列研究线索，对创新和技术不断探索，观众可在博物馆常设展中隐约看到他的理念。此外他对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学、文化学影响也在展厅改造中得到体现。弗朗索瓦·卡隆认为“技术……与社会存在着相互作用”，他将技术史拓展到社会学范畴，历数创新所带来的进步和社会的需求，对技术的“进步”这一概念提出新的见解。这种尝试改变了工艺美术馆文物征集政策的实际标准，为藏品的组成融入了新的视野。

10 藏品号 45298。

11 藏品号 44840。

12 441 型电视接收器 LMT 型号 3703A，藏品号 45296。



技术史文献中心的创立(1960年)以及由莫里斯·多玛斯、雅克·帕洋(Jacques Payen, 1931—1993年)和多米尼克·德·普拉斯(Dominique De Place)所发展的理论体系,确立了藏品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1960年建立的教育服务中心(Service Pédagogique)和1961年建立的青年技术家俱乐部(Club des Jeunes Techniciens)也同样加强了博物馆针对新群体的文化传播力。

国家工艺学院在博物馆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946年建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莫里斯·多玛斯曾一度担任该国际组织的财务官,如今的工艺美术博物馆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的行政顾问团体之一。1982年,在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支持下,科技文化与技术、工业发展博物馆联合会(Association des Musées et Centr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ulture Scientifique, Technique et Industrielle, AMCSTI)成立,由贝尔·库利昂(Hubert Curien)为主席。一直以来,工艺美术博物馆都是此协会的所在地。2001年,国家工艺学院教授多米尼克·费里奥(Dominique Ferriot)在巴塞罗那当选为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行政委员会成员。

媒介与增值

对于收藏的引用、管理和研究都可视为针对藏品的再利用,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更为广大的公众群体。常规展览参观路线的设置(DUFAUX 2013)、临时展览的规划和对于媒介的思考都是服务于藏品,让藏品能够走出校园,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大学以外的老城区。博物馆有着清晰的发展路线:以多义性来消除隔阂,丰富研究领域多样性。

藏品作为研究本体,曾服务于技术教学和创新推广,如今又为服务新的公众群体提供了媒介与增值方面的支持。对于教师、创造者、艺术家、科学家而言,机器与设备中所隐含的创造性为他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新灵感。追根溯源欧洲科学类博物馆(BENNET 1997),“大学”博物馆尤其是工艺美术博物馆无疑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新的模式,其作为科学技术的全新媒介向广大的新群体传播着知识和创新,将经验分享化为了一种文化。

莫里斯·多玛斯相当看重媒介的作用。博物馆的收藏大多古老而陈旧,而媒介能够将19世纪公众视角下的实用科学技术为20世纪的公众所用。这个问题在博物馆的知名度以及让观众不断变化中有着深刻体现。工艺美术博物馆与位于巴黎发现宫(la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的国家技术博物馆在现代化和新观众方面不断竞争,通过展品陈列来体现“充满活力的博物馆学”(muséographie dynamique)。博物馆将翻修和重新演绎的展厅构成“栩栩如生的巨著”,在1959年便有文字记载:“展品应当以鲜活的方式加以表现,即便是在独立的展柜里展示,也应当为演示台留出位置。应当使用多种多样的诠释手段,例如大幅的照片、通俗易懂的说明图、有声的讲解等”¹³。展品的摆放以透景画形式铺展开来,但更注重其内涵,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照片共同展示,使展品融入各自的历史背景。

13 工艺美术博物馆文献,国家工艺学院行政顾问委员会1959年10月28日会议。



而 1990 年以来的改建则与之相反, 更为重视展品在整个媒介系统中所展现的遗产性以及“场所精神”(l' esprit du lieu)。恩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2016 年)将国家工艺学院内的圣马丁德尚教堂(Saint-Martin-des-Champs)描述为“将穹顶之上的神域和恶鬼聚集的地狱合为一体的咒语”(ECO 1990)。这座教堂印刻着诸多往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神圣的宗教场所, 而后成为“空空如也的庙堂, 既没有画像也没有神像”, 只留有“唱诗班旋律中的荣光, 曾摆放祭坛的旧地”。一尊精美的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¹⁴的石膏像放置于此, 让 1883 年拜访法国工艺学院(du Conservatoire)的瑞典国家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惊为天人(STRINDBERG 1990)。帕潘的青铜像自 1886 年起被安放于法国工艺学院的名人庭院之中, 边上还有一尊法国化学家尼古拉斯·勒布朗(Nicolas Leblanc)的青铜像。

改建项目要求在“不丢弃博物馆灵魂”的前提下开发全新的路线, 力求让要求甚高的观众也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发出赞叹。一种围绕藏品的崭新教育理念也依照技术史时代和主题的路线开展(FERRIOT and JACOMY 1998)。弗朗索瓦·达格内(François Dagognet, 1924—2015 年)曾精确定义如何展现展品的价值所在: “比精神本身更为显露……通过展品, 精神能更好地为我们所见。”¹⁵来自多个学科部门的年轻团队遵循展品至上原则, 在全新的常规展览中加入各种媒介工具(关键性展品说明牌、可翻阅的相册、电子图版、教学样品和工作坊), 还有许多用于示范的“展示”和专人陪同讲解。

收藏机构应当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文化政策。从促进民主化和增长民智的方面考虑, 机构应当重视发展更多的观众。学者、专家和博物馆专业人士很快就会在博物馆的库房中, 通过为研究和保存而设的架构发现“隐藏的冰山一角”, 最终折服于藏品的魔力。来自校园的观众则可以倚靠法国教育部。此外, 巴黎有着巨大的文化需求, 这也促使博物馆参观方式和相关的教育活动不断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庭观众成为新的目标。展览的参观路线得以明确: 在七大板块中陈列有千余件展品, 它们自 1.2 万余件藏品中挑选出来, 讲述着技术革命和应用科学; 其中部分基于自身的历史重要性或者本身就是重大发明而被选为“关键性展品”, 这些都在电子图版上加以动画说明(3D), 使它们融入周围所展示的历史背景中(图片、视频、文献)。常设展览可以根据板块的主题加以理解, 但不同主题之间也有横向线索可循。同大多数大学博物馆一样, 展品的特征被植入到历史遗址里, 被重要的历史事件分门别类。这种方式虽然有些拘束, 却能吸引所有的观众。电子图版和多媒体设备勾勒出常设展览, 观众还可以倾听展厅内的数字语音导览。这些媒介手段涵盖了博物馆参观路线的绝大部分, 加深了观众与藏品之间的联系, 加强了参观体验。

14 由艾美·米勒(Aimé Millet)制作的丹尼斯·帕潘石膏像于 1880 年进入法国工艺学院。复制的青铜雕像在 1887 年放置于名人庭院。石膏像原件在 1888 年被美术委员会获得。Arch.Cnam, 2AA/4, 2AA/5, 5AA/11, 5AA/15, 5AA/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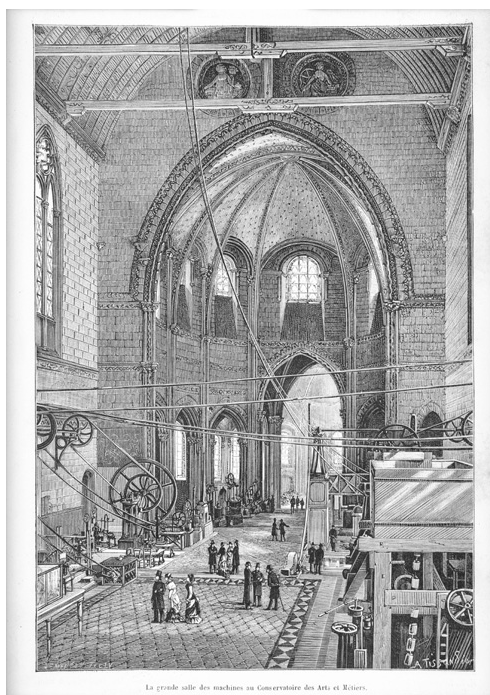
15 《世界报》1993 年 11 月 2 日发表的弗朗索瓦·达格内访谈。



此外,临时展览的性质和质量诠释着博物馆的文化政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博物馆就开始组织大型主题历史展览:“时钟与自动装置”(Horloges et Automates, 1954 年)和“法兰西科学院的历史与魔力”(Histoire et Prestige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 1966 年),以及现代主题展览:“空间”(L' Espace, 1964 年)和“协和式飞机”(Le Concorde, 1969 年)。在博物馆改建期间,馆内馆外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培养了博物馆人员针对更广大群体策划展览的能力,增加了博物馆收藏的自身价值,展览包括:“Volt(a)”(2001 年);“罗盘与兰花”(La Boussole et l' Orchidée, 2003 年);“巴特勒迪:自由女神的建设者们”(Bartholdi. Les Bâtisseurs de la Liberté, 2004 年);“1909 的飞行壮举”(1909. L' Avion de l' Exploit, 2009 年)。还有一些展览则聚焦当代问题:“大气,冰块揭示的气候问题”(Atmosphère. Le Climat Révélé par les Glaces, 2008 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铁路的进步”(Toujours Plus Vite ! Les Défis du Rail, 2009 年);“地铁,通向展览之票”(Métro... Ticket Pour Une Expo, 2011 年)。2016 年,与卢森堡现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艺术实验室”(Laboratoires de l' Art)展览让博物馆将技术与艺术融合起来。借临时展览之机,一些崭新的媒体方式尤其是互动类都得到尝试,协助主题更好地得到理解。同时举办的活动还包括演讲、辩论和圆桌会议,让公众和专家共聚一堂。通过文物的借出和暂存,博物馆的影响不断扩散。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借至法国国内和海外,通过精彩的展览传播着文化知识和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光荣传统。

自博物馆在翻新后再度开门迎客已有 15 年时间,观众作为博物馆的关键点促进着馆方围绕藏品推陈出新。作为隐修院的圣马丁德尚教堂已荡然无存,在大革命时期便成为“技术的圣殿”(Panthéon des techniques),而后来又成了“堆满机器的博物馆”(musée des machines en action)。法国国家工艺学院不忘初心,不断激励着观众和研究者在琳琅满目的展厅、井然有序的库房里探索。数字时代的横空出世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体验仍是重要的,观众与展品的联系仍维系着情感及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此相反的是,面对去物质化时代的到来,物体的专一性正逐步被混合性取代,而观众与博物馆藏品之间的关系则仍是单纯而专一的,正如同人类行为与技术的关系一样。

国家工艺学院的机械馆展厅,
为 1853 年建立于圣马丁德尚教
堂的机械实验室。此图为朱尔
斯·波耶特(Jules Poyet)发表
于 1880 年《自然》(Nature)
杂志的版画,收藏于工艺美术博
物馆图书馆
国家工艺学院工艺美术博物馆/
国家工艺学院照片工作室





“近一个世纪以来，柏格森（Bergson）将物质视为文明在灵性上的补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如今的图像文化、信息文化寻找到躯干式的补充呢？人类的智慧与勤奋一起升华，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与旧时代相比，在我们如今的文化里，精神与实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反转”，这是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¹⁶ 在法国国家太空中心（Centre National d' Études Spatiales）成立 40 周年时所作的发言，当时正值载人航天项目宣布合法化之际。这段话在全球博物馆界尤其是藏有大量人类文明藏品的大学博物馆中引起了共鸣。所有的学者、教师、观众都可以加入这场丰富多彩的对话之中，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加入会使文化变得更为活跃。

参考文献

- Alexandrian, K. 2016. “L' accueil des publics dans les réserves du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colloque international 《Les réserves mutualisées: accessibilité, consultation, préservation, fonctionnalité et sécurité》, Link pôle européen de la Communication, Musée du Cinquenaire, Bruxelles, <http://linkproject.eu/>.
- Bennett, J. 1997. “Le Musée d' histoire des Sciences d' Oxford.”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La Revue, no. 21: 30–38.
- Bontems, V. 2016.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s Objets Techniques Selon Simondon.” *Artefact*, No. 3: 183–198.
- Carre, A.-L., Hilaire-perez L., Corcy M.-S. C. & Demeulenaere-Douyere C., eds. 2012. *L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Techniques, Publics, Patrimoines. Alpha. Paris: CNRS Éditions.*
- Corcy, M.-S. 2013. “La Muséification des Galeries du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Le Cas de l' Exposition Rétrospective du Travail et des Sciences Anthropologiques de l' 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89.” In *L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Les Identités au Défi de la Modernité*, ed. C. Demeulenaere-Douyere & Liliane Hilaire-Perez. Carnot.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 . 2014. “Les Collections de Télévision du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In *Culture TV. Saga de la Télévision Française [Application Pour IPad]*, ed. M. SAUVAGE & I. VEYRAT-MASSON. Paris: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 Smartapps.
- . 2015. “La Politique d' enrichissement des Galeries du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1849—1880.” *Artefact*: 165–182.
- . 2016. “Les réserves du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 《réserves visitables》 ou 《réserves accessibles》 ?” colloque international 《Les réserves mutualisées : accessibilité, consultation, préservation, fonctionnalité et sécurité》, Link pôle européen de la Communication, Musée du Cinquenaire, Bruxelles, <http://linkproject.eu/>.
- Corcy, M.-S. , Demeulenaere-Douyere, C. & Hilaire-Perez L. 2007. *Les Archives de l' invention - Écrits, Objets et Images de l' activité Inventiv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2003.* Toulouse: CNRS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 Dufaux, L., ed. 2013. *Le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Guide Des Collections.* Paris: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 Artlys.
- . 2015. *L' Amphithéâtre, la Galerie et le Rail. Le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ses Collections et le Chemin de Fer au XIXe Sièc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6 论文集《太空的未来会怎样？》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 40 周年研讨会，索邦大学，2001 年 12 月 18 号。正式出版于 2002 年 4 月。



Eco, U. 1990. *Le Pendule de Foucault*. Translated by Jean-Noël Schifano. Paris: Grasset.

Ferriot, D. & Jacomy, B. 1998. "Problématique d' une Rénovation :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In *la Révolution de la Muséologie Des Sciences*, ed. B. Schiele & E. Koster, 21–37.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Ferriot, D. & Lourenço M.C. 2004. "De l' utilité des Musées et Collections des Universités." *La Lettre de l' OCIM*, 93: 4–16.

Fontanon C. & Pestre, D. 1994. "Les 'Leçons Du Dimanche.'" In *L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au Cœur de Paris*, ed. M. LE MOËL, 102–7. Paris: Action artist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Janin, J. & Simeon M. 1999. "Le Musée Ampère et de l' électricité."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La Revue* 26: 52.

Musée National Des Techniques 1994. *Les Réserves dans les musé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 19-20 septembre 1994*. Paris: Musée National des Techniques.

Piacard, É. 1996. "Les Nouvelles Réserves du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La Revue* 15: 24–36.

Strindberg, A. 1990. *Nuits de Somnambule par Jours Éveillés (1883)*. Translated by Jean de Faramond. Paris: Librairie Séguier.

联系方式

Marie-Sophie Corcy, responsable des collections Communication

Address: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292 rue Saint-Martin, F-75141 Paris Cedex 03

E-mail: marie-sophie.corcy@lecnam.net

Lionel Dufaux, responsable des collections Énergie et Transports

Address: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292 rue Saint-Martin, F-75141 Paris Cedex 03

E-mail: lionel.dufaux@lecnam.net

Dominique Ferriot,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ancienne directrice du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E-mail: dominique.ferriot@cnam.fr

关键词

Technical Collections, Collection-based Teaching, Collection Storages, Museum Renovation, History of Collections, History of Technology, Public Mediation